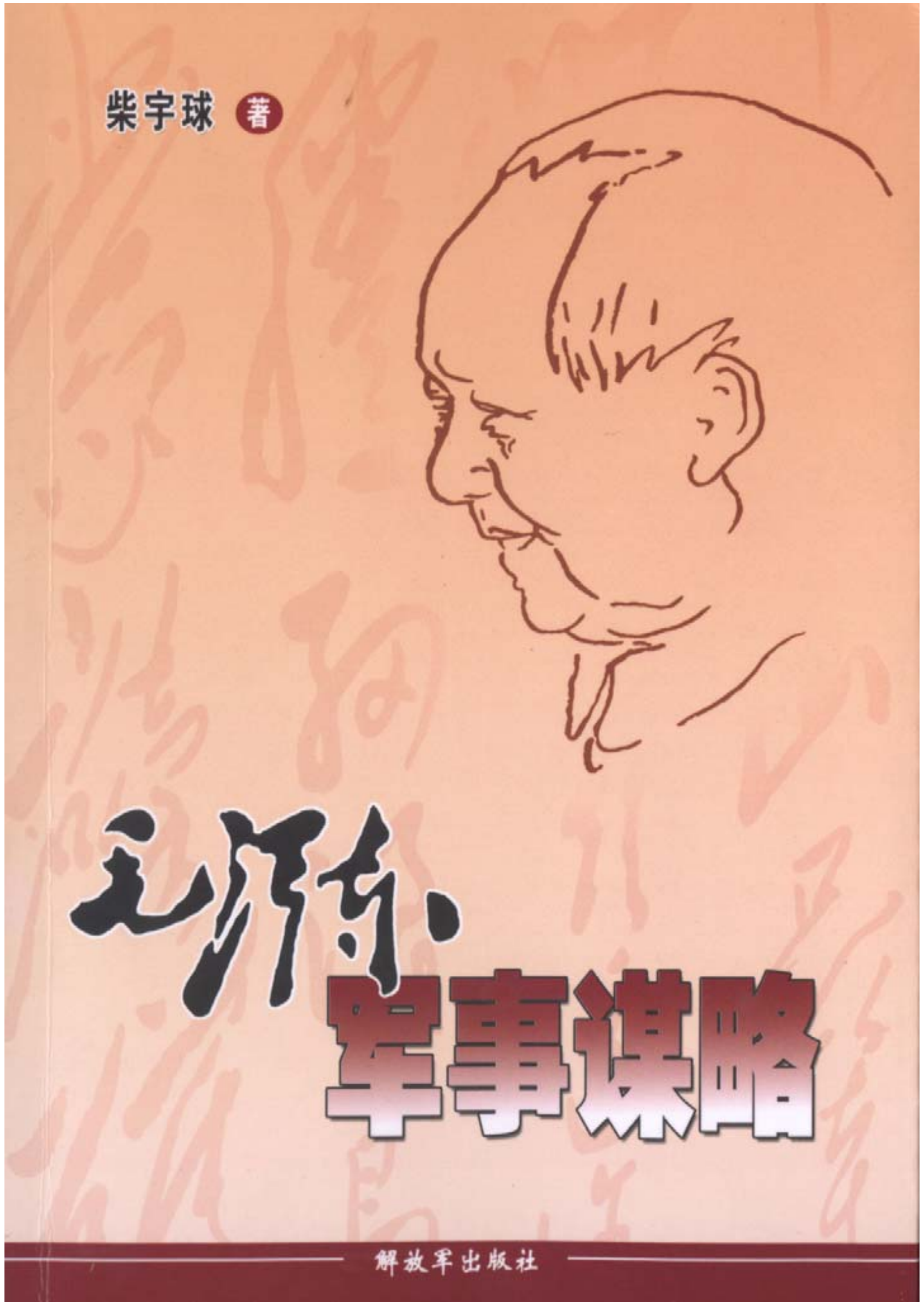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柴宇球：少将军衔，现任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谋略”学科构建者，中国军事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编著有《谋略》丛书（《谋略论》、《谋略库》、《谋略家》）、《毛泽东大智谋》、《军事领导学》等，并分别获得全国图书评选多项奖，发表的数百篇学术论文和军事随笔多次获军区以上单位一等奖，特等奖。

他编写的《谋略》丛书因其体系完整，思想深邃，自成一家而被美、英、法、韩等众多国家智囊机构争相翻译并列为永久收藏的著作，在国际同行眼中《谋略论》有着和《孙子兵法》一样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序

希望自己具有深谋远虑的本领，无论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还是年过半百的长者，都是梦寐以求的。达此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学习、实践、总结、提高。而后是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深谋远虑的本事，主要来源于广博的知识。在信息和知识都以指数形式急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意识到，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有价值，智慧比知识更重要，“智慧就是财富”。然而，当我们进一步研究时就可发现，智与谋仍有一定距离。过人的智慧只有转化为实用的计谋才有意义。识、智、谋的相互关系，其实人们早已用生动的语言表述得明明白白，“识多才能智广”，“足智方能多谋”。学识上孤陋寡闻，智力上平平庸庸，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奇谋妙计的。“长识”、“添智”也不等同于“增谋”，谋略有其自身固有的生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下功夫研究才能把握，下功夫实践才能运用自如。

对谋略的研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我们不难发现，前人对谋略的研究，一是多集中在军事领域。列举谋略事

例，言必称战争和军队。当然，战争的对抗性、激烈性、残酷性决定着它是谋略生成的重要的发源地。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竞争领域更加广阔和复杂，在许多领域，只靠对军事谋略的借用和阐发已远不能适应需要。通过借鉴和嫁接，在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和范围形成各具特色的谋略群，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大多体现在具体技法上。无论是《三略》、《六韬》，还是《三十六计》、《百战奇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谋略典籍，无不是主要简述一个个具体的谋略方法。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特别是一个个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层次激烈竞争，对谋略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之时，需要我们从科学的高度来研究和创造一门崭新的学科——谋略学。欣闻柴宇球等同志一起潜心研究谋略学，并相继出版《谋略》丛书，这是可喜可贺的。我衷心地祝愿他们的研究对于集聚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对于继承和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谋略遗产，对于谋略研究尽快从经验上升为科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希望各行各业热心谋略研究的读者多给予指教。

迟浩田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 (1)

一、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时代背景 ……… (1)

二、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文化背景 ……… (3)

第二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哲学基础 ………… (12)

一、世界观基础 ………………………………… (15)

二、认识论基础 ………………………………… (18)

三、方法论基础 ………………………………… (25)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理论体系 ………… (28)

一、用众——实行上下同欲的人民战争 … (28)

二、御军——建立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 … (39)

三、运筹——实施统揽全局的科学预见 … (43)

四、善战——巧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 (47)

第四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基本特点 ………… (59)

一、政治性 ……………………………………… (59)

二、全局性 ……………………………………… (66)

三、民主性 ……………………………………… (73)

四、灵活性 ……………………………………… (77)

五、创造性 ……………………………… (89)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运筹方法 ………… (94)
一、主客符合，因情措法 …………………… (94)
二、辩证思维，先预后立 …………………… (100)
三、谋势造势，先胜后战 …………………… (106)
四、独立自主，务求主动 …………………… (117)
五、多手准备，以备不虞 …………………… (120)
第六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巧妙运用………… (124)
一、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巧妙结合 …………………………………… (124)
二、歼灭战，消耗战，击溃战，相互补充 …………………………………… (129)
三、政治仗，军事仗，外交仗，多手并举 …………………………………… (135)
四、重谋势，善造势，巧乘势，因势利导 …………………………………… (138)
五、先乡后城，城乡并重，先城后乡，适时发展 …………………………… (140)
六、两面包围，三面包围，四面包围，因情而施 …………………………… (144)
七、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时分时合，视情而定 …………………………… (148)
八、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城阻援，相机而行 …………………………… (151)

九、战略持久，战役速决，内线防御，外线进攻 ……………………………… (154)
十、避实击虚，避虚击实，先弱后强，先强后弱 ……………………………… (157)
十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长击短，趋利避害 …………………………… (160)
十二、诱敌深入，各个歼敌，歼敌为上，守土为下 …………………………… (162)
第七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现实价值………… (166)
一、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是我军“以劣胜优”的必然选择 ……………… (166)
二、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重在掌握其方法论精髓 ……………………… (173)
三、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必须注重谋略与技术的有机统一……………… (185)
后　记 ……………………………………… (193)

前 言

毛泽东是20世纪历史舞台上一位非同寻常的伟大人物。他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甚至是书法家、文学家、诗词大家。今天，当我们把谋略作为一门综合学科来研究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集“多家”于一身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气吞寰宇、智包苍穹、笑傲古今的大谋略家。

毛泽东的谋略博大精深。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统御、外交乃至立身处世谋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而最为辉煌、最为传神、最为波澜壮阔的，则是毛泽东军事谋略。追溯中国革命战争的峥嵘岁月，其形势之险，时间之长，难度之大，为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所罕见。正是有了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科学指引，人民军队才有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指路明灯，才有了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锦囊妙计，才有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制胜法宝。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胜利。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重大发展，是对世界军事谋略宝库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和世界谋略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毛泽东军事谋略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劣势装备的弱小革命力量要想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必须依靠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在武装斗争中，它要依靠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导，要依靠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战略指导。只有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战略指导运筹谋略，才能以巧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毛泽东军事谋略就是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谋略对中国革命战争所起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第一，它为中国革命战争指明了通向胜利的坦途，大大缩短了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大大减少了为革命战争胜利所付出的代价。第二，它指导我党我军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暗礁，抓住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机遇。第三，它为我党我军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使军队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形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条件，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它为我军运筹了一系列转劣为优、以劣胜优的锦囊妙计，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我军力量得到增值，使敌人陷入困境。正如叶剑英元帅指出的，“毛主席用兵如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但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千军万马，而且迫使敌人不得不听从调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都能化险为夷。”

二、毛泽东军事谋略对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的重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军事谋略对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的贡献是极其杰出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战场广阔、规模巨大、斗争复杂、历时长久、敌强我弱，这样的军事斗争实践必然促进军事谋略理论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的精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突出表现在：第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运用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军事谋略，排除了传统军事谋略中夹杂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糟粕，使之成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军事谋略。第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目的，运用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谋略，排除了传统军事谋略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宗旨，使之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的军事谋略。第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把人民群众作为军事谋略运用的主体，使之成为

人民大众的军事谋略。第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把解决以劣势装备的弱小革命力量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作为研究、运用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军事谋略的中心课题，使之成为集传统军事谋略精华之大成的以劣胜优的军事谋略。

三、毛泽东军事谋略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导了1918年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并总结其经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的基础。列宁则在此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宝库，并指出“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在指导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他提出了诸如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等以退却求生存的许多谋略，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发展壮大起到巨大作用。斯大林在指导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也曾在许多方面积极筹划和运用了军事谋略。但列宁、斯大林对军事谋略的论述和实践都不及毛泽东系统深刻，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革命战争经验进行科学概括，升华出深邃的军事谋略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确实是对马列主义军事宝库的伟大贡献。

当我们即将步入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巍峨殿堂领略其波澜壮阔的宏谋大略时，我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军事谋略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如同《孙子》之于朴素唯物辩证法，《战争论》之于古典唯心辩证法一样，毛泽东军事谋略产生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理论体系如何？其谋略思想有哪些主要特点？毛泽东军事谋略高人一等的运筹秘诀是什么？其高超之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信息化条件下，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军事谋略还有没有现实价值？带着这些问题，本书将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批判吸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传统军事谋略思想而逐步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方略与作战方法。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形成，决非偶然和巧合，而是历史与时代相互交融的必然产物。

一、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期，整个世界正笼罩在风云变幻、五洲震荡的氛围之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由初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它正张着血淋淋的大口吞噬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瓜分世界的狂潮，世界大战的阴云愈积愈浓，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在帝国主义加紧对外扩张侵略的时候，中国，这

个东方大国，却由于落后贫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鱼肉瓜分的对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便对中国采取“四管齐下”的侵略政策：军事上，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政府有国无防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经济上，把中国当作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在中国土地上开矿山、办工厂、建银行，进行着殖民主义的疯狂掠夺；政治上，封疆割地，肆意瓜分我大片国土；文化上，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宣传奴化思想，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人员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从事文化侵略。外国列强的掠夺、中国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湖南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内陆省份，在殖民者侵略下，成为外国洋货的倾销地。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掠夺，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加入了逃难者的行列。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无能，使广大农村劳苦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求生存、要活命，许多省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暴动和起义。

这是个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时代，这是个民族受辱、国土沦陷、军阀混战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时势造英雄，乱世出奇谋。“三座大山”压

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旧中国，亟需一个能带领人民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军事谋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军事谋略形成的文化背景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军事谋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湖南特殊的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营养。年青的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群经之首的《周易》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对立统一、生发演化而来，阴阳互依，阴阳互寓，阴阳互化，其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如果读一读毛泽东的哲学经典著作《矛盾论》，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它与《周易》的思想渊源关系。毛泽东还曾全面系统地精研过诸子百家的思想，对管子、老子、孔子、庄子研究尤深，对其精华能够运用自如。在抗日战争中，针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毛泽东在采取对策时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不敢为天下先”；第二句是：“退避三舍”；第三句是：“来而无往非礼也”。第一句话出自老子的《道

德经》，第二句话是晋文公说的，第三句话出自孔夫子之口。这里，毛泽东先礼后兵、刚柔相济、后发制人的谋略思考，与先贤的哲学思考之间密切而天然的联系不言而喻。其他方面，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列子所说的“愚公”、“智叟”等等，毛泽东也都曾进行过研究，并对其中的思想养料加以汲取，在他的文稿和所作的讲演中，我们常常看到古圣先贤的语句。

二是中国的传统谋略思想。毛泽东和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谋略家，十分重视对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法的研究。一方面，汲取其至今仍为科学真理的军事谋略，用于指导革命斗争；另一方面，注重改造其不完善不科学的部分，或汲取反面的教训，创造出新的军事谋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尤其是军事谋略的批判与继承是多方面的，就其作战方面而言，如关于以兵争天下的慎战思想；关于战可知、胜可知的思想；关于知彼知己的思想；关于预有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的思想；关于以弱胜强的思想；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思想；关于重点守备、重点设防的思想；关于以谋胜敌的思想；关于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的思想；关于谋势造势的思想；关于灵活应变的思想；关于因敌制胜的思想；关于以战养战的思

想；关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思想等等，都可以从古代的兵书战策中找到其思想渊源和实例。过去曾有人说毛泽东打仗一靠《孙子兵法》，二靠《三国演义》，其中贬低之意自可不必理会，但这些话也的确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

三是古代的历史特别是战争史。毛泽东酷爱读史，一生中批阅17遍《资治通鉴》。像《左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史籍，甚至包括一些野史、地方志，他都广泛涉猎，有的还研究得很深。毛泽东读史，研究历史，主要是从历代兴亡中寻觅其规律，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其中对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最有心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例，对齐鲁长勺之战还作了精辟的分析。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之后，若干将领腐化堕落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段历史，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善于以史为鉴，善于从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中研究和总结革命战争的指导方略，是我军一次次度过难关的重要法宝，是我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一条

重要经验。

四是古代文学。毛泽东一生喜爱文学，尤其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对于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无不熟悉。如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都有精辟的评论。毛泽东研究文学是和指导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从文学作品中吸收有益的思想营养用于指导实践。比如，他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斯诺在《西行漫记》披露，毛泽东在回忆此事时说：“我相信这些书对于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都是记忆力强盛的年纪里读的。”从毛泽东在文章、演说和谈话中大量引用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和思想也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注意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广泛吸收营养以灌溉其谋略思想之花的。例如，在讲到弱小军队对强大军队作战必须先让一步后发制人时，举了《水浒传》里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故事；在讲到了解情况对运筹决策的重要性，举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在讲到包围和反包围、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时，举了《西游记》里如来佛降服孙悟空的故事；在讲到实行精兵简政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战争机器时，举了孙行者智取铁扇公主的故事，等等。1939 年 7 月 7 日，纪念抗战两周年时，毛泽东出席了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演，他用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的故事勉励同学们上前线，“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些例子散见于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他的革命回忆录里。乍看都是信手拈来的，然而都反映出毛泽东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得益之多。毛泽东对历代散文，尤其是政论、策论方面的文章研究很深，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对这些他都能融会贯通，娴熟地运用于斗争实践，我们今天已很难觅见其神龙之首尾了。

（二）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滋润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最显著、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年青时的毛泽东此时接触了马列主义，这对改变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造，给古老的东方谋略思想赋予了新时代的活力。

古代的谋略理论虽然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还只是朴素的、不完备的，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体系，且大都夹杂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糟粕。例如《易经》中包

含有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它所说的变化，不是向前、向上发展，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重复，用有限的模式概括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易经》的辩证法是装在形而上学筐子里的辩证法。战国时期庄子的思想中包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但又夹杂着相对主义的宿命论；惠子的朴素辩证思想中则含有相对主义的诡辩论①；墨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中带有宗教迷信成份，等等。因此，那个时代的谋略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神秘、虚幻、迷信的色彩。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精通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兵法战策；既是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又是经验丰富的实践家。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把大量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升华为深邃的谋略思想。在他无数谋略艺术杰作中，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宏谋大略为其代表作。他的谋略思考很别致、很奇特、很深邃，最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神韵：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社会中搞革命，却把主战场放在农村；以无产阶级为主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却以农民作为主力军。一位著名理

①《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现代辩论视其为经典。

论家在论及这一点时不由赞叹："这就叫创造，这就叫惊世骇俗。"

正因为毛泽东在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和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突出贡献，因而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公认为革命的领袖。因此，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称之为"毛泽东军事谋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湖南人文环境的影响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大地生长出的巨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为杰出的代表，湖南的人文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湖南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湖南当地的湘学士风对养成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重视实效的用兵特点影响很大；二是湖南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对养成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1. 湖南的湘学士风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清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实学"思想。王夫之是湖南人，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世称"王船山"。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主张"理依于气"、实用为本，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王船山"对湖南的湘学士风有很大影响。

湖南学子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政治运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曾国藩就出在湖南。此外，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兰等，都受教于岳麓书院，他们一方面执守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同时又师承王夫之重外王之术的实学。曾国藩曾着力传刻《船山遗书》，揉和理性和实学，因此贯通内圣外王之道。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又严格整军治政，还是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就曾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① 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收抄了许多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日记，言要转移世风，当重二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直具有研究王船山的实学思想的风气，年青时的毛泽东自然深受影响。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1916 年，岳麓书院把这几个字刻成一个大匾挂在书院的讲堂正门。后来毛泽东两次到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横匾自然给他留

① 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 23 页，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下深刻印象，他后来还对这四个字做出了新的解释。

2. 湖南人的斗争精神

湖南人历来具有为国捐躯的斗争精神。曾国藩剿灭“长毛”（太平军）之后，“无湘不成军”便传遍了全国。湘潭人杨度曾预言，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意思是救中国者湖南也。如果说杨度本人是湖南人有自吹自擂之嫌的话，安徽人陈独秀的话则是有说服力的，他说：“湖南人底（通‘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民族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他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① 毛泽东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于养成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性格，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转引自《毛泽东武略》第 6 页，胡哲峰著，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二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人类一切科学知识的升华和结晶，是谋略的思维工具和理论基础，是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哲学理论，就像是智慧的燧石，当人类在黑暗的未知世界摸索徘徊时，它能迸发出希望之光。

哲学思想指导着谋略活动，谋略活动又丰富了哲学思想的内容。作为人类斗智活动的谋略运筹，特别是带有激烈对抗性质的谋略，是一种在充满不确实性的暗礁险滩中，寻求胜利之途的复杂思维活动。战争指导者要在变幻莫测的竞技场上游刃有余而不致误入迷津，这就更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反过来说，谋略运筹又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一切成功的谋略设计，总是这样那样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开拓了人类的思维空间，启迪人们的智慧，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双向的互补关系，使历史上的谋略大师们，总是兼备这两种素养，相得益彰。历史上许多谋略名著，不仅带有某种程度的哲学性质，甚至就是其时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兵学圣典《孙子》之所以传诵百世、垂范千古，就是因为它通篇渗透着熠熠生辉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知彼

知己，百战不殆”，既是兵家圭臬，又是哲学箴言。在国外，古希腊的哲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对西方军事思想，特别是谋略思想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潜心钻研过黑格尔的方法论，因而他的军事佳作《战争论》具有浓厚的哲学气息。恩格斯赞赏这本书“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①]，列宁称他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家和战争史的著作家。”[②]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不仅在治军作战上有辉煌成就，而且在军事思想上有独到见解。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就包含着理论和实践、一般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思想，在《论持久战》中还加以引用和发挥，论证灵活用兵的重要性。戴高乐说过：“根本没有任何名将对人类思想传统毫无兴趣，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哲学和谋略之间的互相联结和渗透，在前人那里常常是比较零散和朦胧的。这或者是受古代哲学的朴素性所限，或者是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杂质束缚，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3卷第583页。
② 《列宁文选》第3卷第71页。

在毛泽东那里，哲学思维和谋略运筹就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哲学成了谋略创造的思想指针，而谋略则充当了哲学思维改造世界的重要中介。这种特色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和毛泽东个人的卓越才华相关联。

在革命战争时代，毛泽东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紧密结合起来，自如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并据此运筹设计，出谋划策，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引向胜利。在他的许多名著如《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政策》等等，深邃的哲理和高超的战略策略犹如水乳交融、相映生辉，既是宏图大略的谋略杰作，也是发人深思的哲学珍品，读来常能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果我们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时，注意探究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就不仅可以学到设计用谋的原理和方法、悟出克敌制胜的奥秘，而且可以领悟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好像思维领域中的能级跃迁，会极大地增加人们的智慧能量。

一、世界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历史的积极成果，批判地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列宁则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的策略和基本任务的。"② 由此，无产阶级获得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谋略运筹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毛泽东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谋略家的根本分野，正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不同。

谋略家的世界观，对谋略家的谋略思想和谋略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世界观越科学，谋略思想就越先进，谋略活动也就越成功；反之则落后，则失败。古今中外的谋略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一般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来，站在社会进步势力一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人，大都以本时代的积极思想成果即相对先进的世界观为基础，所以视野比较开阔远大，总是能够运筹或采纳高明的谋略，取得极大成功。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人，往往以落后的甚至腐朽的世界观为基础，所以不但自己想不出什么良谋善策，就是别人代为筹划的奇计妙策也采纳不了，最后落得一败涂地。典型事例就是秦末的楚汉之争。项羽在这场斗争的初期，无论实力还是声望，都远远超过刘邦，但经过四五年的争战，双方力量对比完全逆转，项羽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他在临死前还怨天尤人，说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其实不怪天，不怪地，只能怪他自己。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他站在六国旧贵族立场上起兵反秦，目的是为了恢复秦代以前的诸侯割据局面，完全违背了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大趋势。这比之"汉袭秦制"谋求国家统一的刘邦，在政治上就输了一着。他还以贵族老爷态度待人接物，用人讲究身份地位。韩信因为出身微贱，虽有奇才，却始终不予重用，结果把一个人杰拱手送给了刘邦。范增足智多谋，给项羽出过许多好主意，但他常常搁置不用，最后还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把这个唯一的智囊也逼走了。他股肱尽失，一意孤行，纵有拔山扛鼎之力，又何济于事，焉能不亡？

为什么而谋，即设谋者的立场问题，决定谋略的

性质和功能。这个道理古人也有所了解。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这就明确区分了两种对立的出发点。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他所说的"道"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是维护少数剥削分子的共同利益的。但是，它和专谋个别剥削者一己私利的"食"是有区别的。他还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明白显示了利益和目的上的冲突决定了谋略性质的对立。不同性质的谋略，它的功能、效果当然也大不相同。《左传》上有一个曹刿论战的故事："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在强敌压境的严重形势下，那些思想境界卑下，只知道谋个人权势利禄的官老爷们，是出不了什么好主意的。而来自乡间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曹刿，却为鲁庄公筹划了后发制人的妙计，结果以弱胜强，大败齐军，使鲁国转危为安。

世界观对其谋略活动的影响，常常反映在谋略家的阶级立场上。剥削阶级的谋略家，往往为名缰利索、物欲私心所束缚，因而常常心智迷蒙，闭目塞聪，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故意歪曲事实或肆意诡辩，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无产阶级的谋略家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彻底的革命精神，同样

也是毛泽东运筹谋略的世界观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造中国和世界而谋，是毛泽东一切谋略活动的出发点。

应当指出的是，一些为人称颂的谋略杰作，不仅显示了出色的智慧，而且表现了非凡的胆略。历史上的一些奇计，常常又是险计。背水之战如果遇到劲敌，就可能全军覆没；空城计万一露馅，下场就是当俘虏。没有过人的胆识和沉着的心理，断然不敢设想和使用。毛泽东军事谋略令人叹为观止，其原因除了他观点、方法正确和知识渊博精深之处，还在于他有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献身的伟大精神，这一点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重庆谈判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谋略杰作光耀千古，而这一谋略杰作的最强闪光点，则是毛泽东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赴龙潭虎穴的雄伟胆略。在这里，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支撑整个谋略活动的最重要的基石。

二、认识论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使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精髓所在。毛泽东把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看作是谋略运筹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并把这一矛盾的正确解决作为谋略

成功的关键。他指出，多打胜仗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他认为，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从认识论的高度，解决了谋略运筹的根本问题。它既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毛泽东全部谋略活动的认识论基础。

(一) 坚持知行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十分强调实践的观点，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初期写下了《实践论》这篇光辉的哲学论著，毛泽东当时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的。在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全局，虽然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政策与纲领、谋划与指导都归于失败。毛泽东有鉴于此，以极大的精力和智慧，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造，在全党

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大教育，从认识路线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人在研究国共两党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时，都承认共产党的战略政略高国民党一筹，而且共产党军队的各级指挥员往往也都在谋略上高国民党军官一筹，但人们感到迷惑的是共产党军队指挥员的文化水平都普遍比国民党军官的文化水平低。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毛泽东通过提倡全党学哲学，比较好地解决了党的干部的认识路线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的谋略家。

毛泽东在他的另一篇哲学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写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套用这段话，也可以这样说：人的高明谋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人的高明谋略只能从斗争实践中来。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毛泽东军事谋略正是建立在这种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他的一切谋略创造，始终坚持知与行的高度统一。

（二）注重主客符合

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是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而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创造出高人一筹的谋略，调查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和一切国内外敌人斗争中，总是足智多谋，棋高一着，除了他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渊博而又精深的多方面学识之外，还得益于他在调查研究社会情况方面的深厚功力。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懂得了向社会学习实际知识的重要性，称之为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期间，他约一位学友以游学方式，步行近千里，历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了解农村情况。次年又和蔡和森一道沿洞庭湖半圈作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更加注重对社会情况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像1927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多次进行的农村调查，就是一些著名的成果。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使他对中国社会获得了真知灼见，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厚实可靠的根据。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第147页。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研究和指导革命斗争，在毛泽东的谋略生涯中是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比如，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问题，毛泽东主张"上山"，到农村去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有人指责说，这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因为这里客观存在着三位一体的条件：一是半殖民地的条件，二是大国的条件，三是今日时代的条件，即有了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这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三）善用矛盾思维

世界是矛盾的，因为矛盾才需要谋略，因为矛盾运动才产生了谋略。谋略家的任务就是认识矛盾，把握矛盾，驾驭矛盾。谋略家的本领就在于比别人更早、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矛盾，并提供促使矛盾朝着有利于己方转化的谋略指导。

战争是矛盾的集合体，政治矛盾、军事矛盾、经济矛盾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尤其在战争的转折关头，总会卷起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惊心动魄的云漩浪涡，这时，分析矛盾、认识和把握战争发展的大趋势，就成为战争指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37年8月写下了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矛盾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阐发，也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矛盾论》是毛泽东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可以这样说，矛盾思维是打开毛泽东军事谋略思维宝库的"金钥匙"。

毛泽东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和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开宗明义提出了"着眼其特点"，对特定战争进行具体分析。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战争研究中的实际运用。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善于抓住敌我双方矛盾着的各个基本特点，细致地分析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从而预见战争的发展方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中日、国共、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构成中日战争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矛盾统一体。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中日矛盾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不义我正义，敌寡助我多助，并指出这四大要素的相互作

用，从其内在联系的总和中，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结论。不仅如此，他又从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的消长变化，预见到了抗日战争进程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达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从事物的变化运动中把握矛盾的发展过程，廓清了当时战争指导上的重重迷雾，其《论持久战》不仅成为指导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而且也是当时国民党将领的必读书。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揭露并把握战争的本质规律。事物的本质是由内在的固有矛盾决定的，认识任何事物，只有分析研究其内在矛盾，才能揭示并把握其特殊的本质。毛泽东一贯把研究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上，并把“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区别提到两种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批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时，就是从分析当时社会内在矛盾入手的。他详细考察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及人民大众与反动统治者之间、各军阀派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预见不久将会“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这就为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毛泽东透过白色恐怖，看到布满“干柴”的中国大地，必将出现星火燎原之势，据此确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指导方略。

从此，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峰回路转，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解放战争初期，国内外有不少人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现象所迷惑，毛泽东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把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美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卓越眼光，透视国际矛盾，意识到这是东西方两大阵营迟早都要到来的一场必然较量，并透过敌人貌似强大的反动气势，看到了美帝国主义“钢多气少”的虚弱本质，果断地做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三、方法论基础

谋略思想之泉在中华古国源远流长，谋略实践之花在神州大地繁盛不衰。究其根底，是因为谋略运筹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思想最早发动并勃兴于东方的思想沃土之中。

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易经》，既是东方文化的源头，也是东方哲学和东方谋略思想的源头，它的精华就是朴素的二元辩证法——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互寓、阴阳互依、阴阳互化。一阴一阳，构成了世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矛盾运动。辩证法思想的哲理之光引导着一代又一代谋略家进行着富有活力的谋略创

造。像老子的"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谋略思想，实际上就是辩证法思想在谋略理论中的反映；像孙膑的"围魏救赵"、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谋略创造，实际上就是辩证法思想在谋略实践中的体现。

当然，古代的辩证法还是朴素的，马克思对人类的思想成果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造，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宇宙万物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大师，对唯物辩证法的精义宏旨作了鞭辟入里的说明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答和解决了军事谋略运筹中一系列重大矛盾和范畴，如敌与我、众与寡、攻与守、进与退、强与弱、涨与消、虚与实、先与后、近与远、迂与直、劳与逸、静与动、胜与败、险与夷、集中与分散、主动与被动，连续与间歇等等，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深刻把握其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和规律，进而因情措法，恰当地加以运用。例如，以迂为直、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逸待劳、以攻助守等等一些极富方法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精髓的谋略思想，在毛泽东的论著和文电中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战略层次上的谋略运筹，最能透出毛泽东辩证思维的神韵。他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其他因素，分析战争性质和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关系、战争特点与军事战略的关系、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关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保守地方的关系等等；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作战原则，从而能够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军事谋略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体系极为博大精深。从战略到战术；从知敌、料敌、诱敌、歼敌，到建军、御军、练军、用军；从动员民众参战、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行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并用，攻心夺气，瓦解敌军等，构成了内容宏富、精妙绝伦、气势恢宏的理论体系。其中，用众、御军、运筹、善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中最为精彩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毛泽东军事谋略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用众和御军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理论基石和力量基石；运筹和善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发挥作用和施展艺术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一、用众——实行上下同欲的人民战争

有史以来，动员民众进行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胜枚举，孙子就有“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精辟论述，但历朝历代的军事谋略家都是把人民作为工具和利用的对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争观，把军事谋略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放在为了人民、动员人民和依靠人民上，实行上下同欲的人民战争，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谋力于民

历代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贵民、重民思想，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特别是由于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支配，历代军事家、谋略家从来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根源，更不可能运筹、谋划、动员、组织、武装群众进行造福于民的战争。他们与人民群众始终是利用被利用关系，是主仆、役使关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力量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谋略思考。

第一，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出发，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战争的主体，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明确“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① 第二，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千百万群众争取自己解放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揭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0页。

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进而确立了必须动员、依靠、组织、武装群众进行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第三，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中国革命特点出发，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因此，动员、依靠、组织、武装群众的中心任务，是把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这就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把人民群众这一战争力量根源具体化了。第四，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力量根源的作用出发，揭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只有使军队和人民紧密结合，才能使人民群众这一力量根源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战争之中，才能使革命战争的胜利得到根本保证。

总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谋划战争力量时，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强调只有他们，只有军队与他们紧密结合，才是革命战争的胜利之本。这就在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战争力量的根源问题。

（二）谋根于民

解决战争中的后顾之忧，是战争指导者必须思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谋略，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重大贡献，也是红军与历史上农

民起义军在战略指导上的根本区别之一。虽然这一谋略并非毛泽东首创，在朱元璋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就产生了。但直到中国革命战争之前，还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像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这样成功地依靠革命根据地解决了战争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土地革命初期，我军经常要流动作战，吃饭、休息、服装和人力补充、伤员医治等一系列问题都随之而来，特别面对国民党军的连续进攻，红军的生存、发展和开展斗争问题都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已经势在必行。对此，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指出，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①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把剩下来的革命力量带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建立中国革命战争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此后，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右江等若干大小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迅速遍布全国20多个地区，总兵力达7万余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方面为红军提供了休养生息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红军从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协同，并形成了“三结合”的力量体制，红军可以依托根据地与敌巧妙周旋，各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72页。

根据地之间彼此策应，根据地内部军政军民团结，使国民党无可奈何。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屡“剿”不灭的切齿痛根的“眼中钉”、“肉中刺”。难怪国民党的“小诸葛”白崇禧发出“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的感慨。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使弱小的我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得以生存和发展，也为我军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谋利于民

寻求到战争力量的根源之后，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这是战争指导者必须回答的第三个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关键是要谋利于民。从本质讲，革命战争的目的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然而，有了正义性，只是具备了动员群众参战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要有正确的主观指导。

首先，要进行积极的政治动员，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比如抗日战争，就必须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

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① 动员中，“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这样才能统一亿万群众的思想，步调一致打胜仗。

其次，要把革命的利害关系告诉民众。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群众是不会真正行动起来的，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② 从搞好战争政治动员和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这两条原则出发，我党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和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在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我党我军所到之处，从土地、劳动，到柴米油盐，一切关系群众利益的实际生活问题，都在我们议事日程之中。特别是针对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我党在不同的战争时期都及时制定了土地政策，较好地扩大和保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8、4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把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实惠，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红军、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抗战极端困难的时期，我党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热情。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使亿万农民得到翻身解放。据1946年6月统计，解放区约有1亿农民分得375,00万亩土地，根本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土地改革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华北解放区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山东解放区有580多万民工支援前线。正如周恩来在谈到土地改革与革命战争关系时指出的："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①

历代政治家、谋略家都在苦苦探求"爱民"之道，不少人提出诸如"爱民如子"，"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不能不爱民，不能不利民"等颇有光彩的警语。但由于他们从根本上与人民群众是对立关系，因而从来没有做到真正的爱民、利民、为民。只有以人民解放为己任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做到爱民、利民、为民，才能运筹出一系列谋利于民的韬略，从而激励了他们为自己翻身解放而献身于革命战争的极大热情。

（四）谋民于战

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积极性后，如何恰当地组织和运用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是战争指导者必须回答和解决的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历代政治家、谋略家所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伟大的谋略创造，解决了发挥人民群众作用的组织斗争形式问题。

为了把人民群众组织到革命战争中去，需要有效的组织形式。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即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8页。

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这是一个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巨大力量的宏谋大略。

第一，它能充分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威力。如果用图形表示，可以画成四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中心是主力兵团，由此向外，第一层是地方兵团，第二层是武装群众，第三层是非武装的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看出，"三结合"的力量体制，使革命战争形成了以主力兵团为中心、有全体人民参加的层层结合互为依托的全民战、总体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单以我军的数量与敌人相比，我们总是劣势，但是，当我们形成"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时，我军的力量就得到极大的增殖，我们力量的砝码就大大超过了敌人。因为我们是以全体军民的整体威力去对付反动军队的，而不是仅仅以数量有限的弱小的我军去对付强大的反动军队。

第二，它能形成对敌作战的主动性和高度灵活性。因为这种武装力量体制在作战运用上分合迅速，攻守自如。主力兵团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实施高度机动作战；地方兵团则固定在一定地区内执行保卫地方、巩固后方和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的任务；民兵游击队通常不远离家乡，或配合正规作战，或单独开展游击活动，保卫生产，保卫家乡。总之，三种武装力量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可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第三，它有利于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三种武装力量，实际上是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武装，它们既有区别，又可以根据需要互相转化。尤其是人民军队的发展，不能采取招兵买马的办法，只能依靠人民自愿参加，这就要求有一个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扩大人民军队的办法，"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我军每到一地，首先帮助人民组织以本地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同时还组织与斗争形势相适应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产生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样既适应了我军是靠人民自愿参加的特点，又能确保人民军队的政治、军事素质。

为了充分发挥亿万群众的巨大力量去打击敌人，需要正确的斗争形式。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斗争相配合的斗争形式。他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所以应使"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实践

证明，这样做，在政治上，就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军事上，就使敌军处处遇到抵抗，处处分散和消耗兵力，便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在经济上，就可以破坏敌方经济的发展，造成我军物质供应的可靠来源；在文化上，就可揭露敌人，教育和团结人民。一句话，就使敌人陷入我全面打击之中，这就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战争中的一方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并对这种力量进行自始至终的科学运筹，就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总之，毛泽东的“用众”谋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的“围剿”，由于毛泽东“用众”谋略的指引，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和依靠人民，不但打破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而且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寇入侵，毛泽东的“用众”谋略，指引人民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持久战、游击战，把侵略者搞得焦头烂额；三年解放战争，来自人民和为人民而战的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如疾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使国民党800万军队不堪一击。可以说，毛泽东的“用众”谋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一切胜利的力量渊源。这一谋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即使把它明白地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也无法应对，更无法运用，因为人民的敌人不可能真正为了人民、代表人民，不可能实行和应付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

二、御军——建立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

军队是战争的骨干力量，是运用军事谋略的物质基础。建什么军队，怎么建设军队，怎么领导和指挥军队，怎么训练和使用军队，历代将帅都有大量的实践。而毛泽东在建军、治军、练军和用军上，实践之丰富、谋略之高超，是前无古人的。

（一）创建革命战争的暴力工具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暴力革命学说的正确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吸取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③] 明确指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91。

欢迎访问:中华谋略网 网址：www.zhimou.net　欢迎加入中华谋略 QQ 群：31301069 & 14247021　振兴民族谋略，弘扬人间正气。

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论断，使我党认清了武装斗争和建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以南昌起义为起点，我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用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先后进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暴动。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为中国革命战争积蓄了力量。特别是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整编了部队，建立了党组织，制定了政治制度，建立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部队和其他各地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中流砥柱。从此，中国广大的穷苦人民有了一支真正代表、谋取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真正有了一支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力工具。

（二）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了使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从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比如，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把军队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只能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红军建立后，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和成分的日益复杂，旧军队的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

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等残余思想大量涌入，对部队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为此，毛泽东为军队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建立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军队政治机关制度、军队党委和党支部工作制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等，确保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和对党对人民的绝对忠诚。此外，他还进一步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正确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等，并在此后的革命战争过程中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这支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

古人云，“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道理。从人民军队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高度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把这看成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战斗非常紧张，进行教育训练十分困难。用毛泽东的话说，“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怎么办？毛泽东指示，“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

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①]在他的指示下，我军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军事训练。如各部队结合战评与实战需要，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各级指挥员根据作战任务，通过实地侦察与沙盘作业，研究克敌制胜方案；各大军区、各野战部队还开办了军政学校、技术学校和干部轮训队，加强干部培训，先后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几十万干部，有效地提高了我军战斗力。

（四）执行严格的革命纪律

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先后制定了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纪律，教育广大干部战士爱护群众一针一线，坚决破除军阀部队遗留下来的流氓习气，同一切旧军队的坏习气、坏作风划清界限。这不仅改善了军民关系，也使广大指战员懂得了红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政治本色和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革命道理，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严格的革命纪律，不仅贯彻于革命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就是在革命将要成功或者已经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攻打上海的一天早上，一位资本家推开窗户惊奇地发现，在街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8、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道马路和他的宅院外，整齐地睡着一排排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和佣人都不知道。这位资本家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军队，唯独这支军队最不扰民。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蒋介石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这句话很是意味深长，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可以这样说，执行严格的革命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是党和军队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强敌、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运筹——实施统揽全局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的谋略预见，具有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气魄宏大的特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中，他所关注的往往是关系到革命斗争道路的选择、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以及战略形势的转换前景等重大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预测，也就具有一种指明方向、揭示规律、展示前景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雄才大略。

（一）指明革命斗争的发展道路

道路的选择是革命发展的关键。只有选择正确的道路，才能保证革命斗争从谷底走向胜利。而指明革命道路，需要有对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能够站在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进行超前思维，预见事物发展的大趋势。毛泽东是具有这种天才的伟大的革命先知者。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正

是毛泽东以他超乎常人的特有智慧和预测能力，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当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大地血雨腥风、共产党人几乎处于绝境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带领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后又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及时总结创造、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从农村根据地向城市进军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恐怕还要在黑暗中多走几十年。"①

（二）推算和驾驭战争的大体进程

在战争指导中统观全局，预见未来，这是驾驭战争的奥秘。而合理地预测战争进程，描绘战争发展的基本轮廓，则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是自觉地把握战略全局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出的运筹全局的杰出才能，是以对战争发展变化的科学预见为基础的。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93。

寇的猖狂进攻和敌优我劣的不利局面，毛泽东敏锐地预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结局，同时又科学地提出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优劣转换需要时间，因此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各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以及我应采取的战略战术，从而清晰而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致进程和轮廓，为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战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毛泽东善于根据战争发展情况，适时地组织战略转变，紧紧地把握着战争的全局进程。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这时，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但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都还占有优势。面对依然十分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了战略局势发生转换的可能，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为此，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举行全国性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并做出了实行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挺进中原的大军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的前沿阵地，从而促成了战略全局的转换，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预见战局结果及时部署续战

作为作战指导者，正确地估计每一个战役行动的结局及其对战略全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部署下一次作战十分重要。对此，毛泽东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认为："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①] 因此他要求："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于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②] 从战略全局出发预测战役行动结局，这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战略决战之所以首先在东北战场发起，是因为毛泽东预见到，我军如能顺利实现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的预定目的，不仅将极大地震动华北和华东、中原敌军，而且可以使东北野战军成为我军的一支强大战略预备队，尔后不论使用在哪个战场，都能比较有把握并有利于推动整个战局的发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不等蒋介石和傅作义反应过来，接着进行了平津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

① 《毛泽东选集》内部本第 20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内部本第 205 页。

军队 47 万人，取得了酣畅淋漓的胜利。由于毛泽东能够客观正确地估算战役战斗的变化，及时灵活地用兵布阵，使得解放战争这盘棋很快就走活了。

四、善战——巧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①]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军事谋略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生动地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军事谋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拘泥于古人和书本，不照搬现成的经验，而是通过对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奇正相生

战不过攻守，法不过奇正。毛泽东本人虽然对奇正的直接论述不多，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践中却把奇正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毛泽东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敌

①《孙子·虚实篇》。

人，这算“正”；但这一谋略的高明之处是，不仅为我军找到了力量源泉，而且它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了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人民的依靠，一招就从战略上致敌于被动。政策宣传敌我双方都在搞，但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写到了老百姓的墙上，使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主张统一战线的，如果蒋介石拒绝采纳这一主张，就是违背民意，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当中，他“经略中原”谋略也是他活用奇正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一贯主张“敌进我退”，这一点国民党军队很清楚。因此，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发起重点进攻，企图首先解决我西北和山东解放区问题。在国民党猛烈进攻面前，毛泽东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敌进我进”谋略，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以一记致命的“猛虎掏心”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一举激活了战争全局。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因情、因势、因敌、因时活用战法，时而以奇制敌，时而以正取胜，达到了“奇亦胜，正亦胜”的高超境界。

（二）利害相衡

客观地分析形势，冷静地权衡利害，不逞一时之勇敢，不计一事之得失，是我军在强敌面前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原因。

古人讲，“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我军要战胜敌人，必须有高超的权衡利弊的技巧，必须有高明的趋利避害的战略战术。因此，毛泽东把“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他认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就应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则根本不干。”① 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坚持以“避害”为主，勇敢地退却，不逞一时之勇，不赌一时之气，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一旦我军转到有利地位，就不失时机地“争利”。即使这时“害”大一点，只要利害比较之下得“利”更多，也坚持与之决战。这样不仅歼灭了敌人，也收复了土地，发展了进攻。解放战争前期，蒋介石集中了23万大军，对我陕北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机关于延安。是走是留，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他说，“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中央撤离延安后，西北我军牵着敌数十万大军在西北高原上进行武装大游行，弄得敌人士气低落、精神疲惫。我军则乘着我主力逐渐集中、形势对我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为有利之机，果断发起进攻。首战青化砭，歼敌31旅2,900余人；二战羊马河，歼敌135旅4,700余人；三战蟠龙，全歼蟠龙守军6,700余人。不但稳定了西北战局，收复了大片失地，也为陕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德国进攻下一度节节败退。这年7月，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举行有70万人参加的“关特演”大演习。斯大林为防止日本背后偷袭，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抽调若干旅团摆在长城一线，以牵制日本可能对苏联的进攻。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毛泽东都认为中共应该帮助苏联，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帮助应当从自己的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以弱小的八路军与日军硬拼，采取决战姿势，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当时八路军正处于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八路军平均每支枪只有20发子弹，机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破用的炸药几乎没有，敌我武器装备相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毛泽东说：“假如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配合的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目前只能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①

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拒绝他的建议要有多大的勇气，顶住多大的压力！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才敢这么做。

（三）刚柔相济

毛泽东用兵作战，不仅善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军，同样十分善用非军事手段去夺取作战的胜利。一是善于将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手段相结合，陷敌于政治和外交上的不利地位；二是善于将军事攻势与心理攻势相结合，破坏敌军的精神防线；三是善于将军事手段与和谈、策反、接受起义等非军事手段巧妙结合，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利益。平津战役之前，毛泽东指挥我军秘密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之后采取“吃两头、留中间”的方针，首先吃掉了张家口、新保安、塘沽和天津守敌，彻底粉碎了北平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企图，极大地动摇了傅作义集团顽抗到底的决心。为了降低我军的伤亡，同时避免北平这一历史古都遭受战火的破坏，毛泽东秘密派出代表与傅作义进行了多次联系，进行政治争取，实施心理攻势。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巨大的政治攻势和蒋介石虎视眈眈的吞并野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651页。

心，傅作义不得不理智地接受了改编，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同年8月，毛泽东又以极大的信任委派傅作义到绥远，动员并协助董其武将军起义，使我军又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放了绥远。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用这种刚柔兼施的手段，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多达一百多万，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四）虚实相乘

毛泽东是巧用虚实的大师。一是在力量投入上，善于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场形式的变化，灵活地采取避实击虚和避虚击实等谋略。二是在布势上，善于隐真示假，声东击西，歼敌于意料之外。三是在作战手段上，善于虚虚实实，调动敌人。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受蒋介石密令，调遣两万余人的“援晋兵团”准备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时西柏坡仅有少量警卫部队，如果被敌人偷袭，后果不堪设想。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一面令附近的部队回援，一面镇定自若地以笔代兵，巧唱了一曲现代“空城计”。他连接播发3篇新闻及评论，将前来偷袭之敌的番号、动向、企图以及我军的部署和众志成城的决心通过电波发了出去。傅作义本以为这次偷袭十分秘密，必能成功，没想到我军早已了如指掌。既然我军已经警觉，再进行长途奔袭只会损兵折将。傅作义本来就不愿让自己的部队替蒋介石送死，这么一来，蒋介石越是催得紧，傅作义越是不愿去。最后，蒋介石

前脚刚离开北平，傅作义就把部队撤了回来。如果说蒋、傅之间不和是一个重要原因外，毛泽东巧于以虚为实，也是党中央避免这次损失的重要原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还有许多虚实相间的战略战术，真正把孙子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实而备之”等经典谋略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五）长短互补

长短互补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将长远谋划与临机决断巧妙结合。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善于从战略上进行运筹谋划；而他的麾下，聚集着一大批善于临机决断、随机应变的优秀将领。在总的作战方针拟定之后，毛泽东总是赋予下级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指挥权，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做到“将能而君不御”，使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战场上的临机决断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作战方法上注重以长击短、扬长避短。毛泽东无论实施战略指导，还是实施战役战术指导，都要周密地分析敌人之长处和短处，强点和弱点，我方的优势和劣势等诸因素，务必找出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战法来。比如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上，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等长处，分析其侵略战争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本质，以及军力、经济力都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等弱点；认识到我们的弱点是人民缺少组织，武器装备短缺，但我们的根本长处是实行反侵略的正义战

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并有广大的国土可以周旋，他将诸因素加进去，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使我方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敌人的短处得到充分暴露。在战役战术上，无不是极力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方法，像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袭击战等各种游击战法的提出，都是运用以长击短谋略的具体体现。

（六）优劣互换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强胜弱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是战役战斗还是战争的最后结局，如果没有压倒对方的优势力量，不能实现优劣互换，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在战争开始的阶段都是处于弱势和劣势，如何实现优劣互换、以弱胜强？毛泽东通过研究中外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经验，找到了优劣互换的途径。他指出：“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首先，虽然敌军在全局上是强的，但在作战过程中、分散的各个战区、各个战略方向、各条战线、各个部队、各种不同条件下，总会有弱的局部暴露出来。这就为以劣胜优提供了条件。其次，弱军在战争指导上可以而且必须运用以强胜弱的规律，按照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努力

使我在全局的弱中造成局部的强、使敌在全局的强中造成局部的弱。再次，采取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等战法，积小胜为大胜，把战场局部的一个个小胜利变为战争全局的大胜利，由量的积累促进质的变化，从而推动战局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最终实现优劣互换，以劣胜优。

（七）攻防互助

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重要特点，是防中有攻，退中有进，进退结合，攻防互助。攻防互助的战略战术，贯穿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始终，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防御。他认为，单纯防御是专守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能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才能最终消灭敌人，达成作战目的。二是坚持以迂为直，以退为进。表面上看，以迂为直是敌进我退，敌攻我守。但实质上这种退却和防御暗藏玄机——暂时走弯路是为了保存实力更好地走直路，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井冈山时期的反“进剿”、反“合剿”、反“围剿”斗争，长征时期走的那么多弯路（即所谓的“弓背路”），都是以迂为直，以退为进，这些暂时的退却和防御，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实力，打破了敌人歼我主力于一役的企图，而且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三是避敌正面，敌后歼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

节节败退，为了扭转局势，八路军、新四军逆着日军的进攻方向，向日军占领区进军，打击敌人的后方。正如朱德所说："我们的退却是走小路、爬山，绕到敌人的后方，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打敌人的后尾。"这样就把战略上的退却变为实质上的进攻，将我军战略上的防御战变为敌后的袭击战、破坏战、游击战等形式多样的进攻战，使日军首尾难以兼顾。这样一方面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战争资源，牵制了敌人的作战力量，使敌人不仅要考虑进攻，又要考虑防御；另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

（八）分合互变

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古代兵法认为，兵散则势弱，兵聚则势强。孙子强调"我专而敌分"、"以镒称铢"；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普遍的制胜因素"。讲的都是集中兵力。毛泽东在指导战争实践中，既讲集中，又讲分散，善于分合变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就是毛泽东巧用力量的生动写照。一方面，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不断壮大革命的力量。为此就必须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出去，做"撒网式"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为了战胜眼前之敌，毛泽东十分重视集中兵力。他深刻地指出，"作战的

奥妙在于集中兵力"，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专门写了"集中兵力问题"一节。开头即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的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在我们军队的战史上，运用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原则的成功战例数不胜数。而这一办法，人民军队的敌人却难以学到。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

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使我军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就是我军力量强大了，毛泽东同样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比如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每一战役的指导方针都有很大的不同。辽沈战役，采取的是"关门打狗"的策略，先取锦州，断敌归路，再击沈阳、长春。淮海战役，先"集

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继则采取“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的方针，打死黄伯韬，生俘黄维，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而平津战役，则采用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等方针，迫使傅作义起义。毛泽东从战略指导到战役战术，无不贯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以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谋略活的灵魂。

第四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与古今中外其他军事谋略相比，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性

（一）坚定的阶级性——谋求民众的翻身解放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上个世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时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内有封建地主阶级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为了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暴力摧毁反动国家机器。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敌我，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他还善于用政治分析的观点认识战争，认为“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把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战

争，一类是非正义的战争，要“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些思想的提出，清楚地表明了其谋略思想的阶级特色。

阶级立场不同，服务对象自然各异，所以姜太公为西周谋，范蠡为勾践谋，张仪、苏秦为自己谋，张良、陈平为刘邦谋，诸葛亮“两朝开济老臣心”只为刘备父子而谋。服务对象各异，谋略的本质也就截然不同。这里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从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不同的阶级特色来。

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军攻下徽州后，他的部下纷纷劝他效仿其他反元实力人物自立为王，但名士朱升却向朱元璋进言说，应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九字策”为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军事、政治激烈较量中赢得了主动，最终实现了灭元建明的宏伟政治目标，其谋可谓高明矣！

数百年之后，毛泽东翻用了朱升的“九字策”，他针对当时险恶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两个“九字策”，应当说它们的内容和思路是很相近的，而且很显然是毛泽东从朱升那里化用而来的。但是由于着眼点不同，其阶级特色迥然各异，一望而知。

（二）广泛的群众性——挖掘无尽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伟力之上

的。毛泽东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基于这些思想，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动群众的广泛性问题。在战争年代，将解放区或根据地90%的工农大众，包括妇女儿童都动员起来，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另一个是发动群众的持久性问题。革命就怕三分钟热血，就怕耐不住挫折和失败。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始终能够极大地唤起民众、凝聚民心、运用民力，调动人民群众中的一切积极因素运用于战争当中。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支前民工500多万人，担架10多万副，大车38万辆，牲口100万头，粮食85亿斤，我军与民工的比例竟达到一兵一民（工），一兵二民（工）甚至一兵三民（工）。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有220余万人，为前线筹集运粮达43亿斤；平津战役，为前线筹集粮食31亿斤。华北全区平均每个人负担22斤，冀东人民则为36斤。华北人民为了保障战役胜利，除随军服务人员外，参加修路、运输、看押俘虏、后方警备等共有10万余人。解放区

广大人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对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既是人民群众革命觉悟的充分体现，也是毛泽东将指导战争的谋略基点置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毛泽东十分感慨：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北方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陈毅同志在谈到淮海战役时也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根据地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同样，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常常是敌人进了我根据地就成了聋子、瞎子，而敌人的动向我军随时都可以掌握。可以这样说，广泛的群众性既是毛泽东谋略筹划的基本依据，也是他谋略成功的根本保证。

（三）彻底的革命性——义无反顾地破旧立新

毛泽东的谋略思想和谋略实践，处处都闪烁着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的光彩，体现着破旧立新、谋求亿万群众翻身解放的雄伟胆略。

第一，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的，是可以战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想从人民手中夺走胜利果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则要保卫胜利果实，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蒋介石有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作后台，加上他本身还有几百万军队，掌握着全国政权，对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美国人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美国人的话，否则美国人会骂你们，会给蒋介石撑腰。毛泽东慨然作答："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并不是说大话，而是基于对反动派的本质的深刻认识。在毛泽东看来，反动派如同吃人的野兽，"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为了生存，为了胜利，只有不屈不挠地斗争，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毛泽东还看透了反动派的虚弱，它们背离人民，外强中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宋代武博士何去非在《楚汉论》中写道："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并说："以力则不着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他以楚汉之争的历史事实说明，项羽虽然"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人之功，搏卒决战足以吞敌人"，但这并不是那种"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的"所谓真力"。而刘邦则不但能"挟在己之智术"，而且还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因此，"天下之

智皆其资也”，项羽无“真力”而失天下，刘邦有“真智”而得天下。毛泽东深谙“王道”之真谛。他领导人民谋天下，既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美德，又有猛将如云，智士如雨，焉有不胜之理！

第二，一切反动派都是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是必须打倒的。在中外历史上，革命力量因害怕敌人压力，不敢斗争而失败者有之，因受敌人欺骗而失败者亦有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人犯过这两种错误，都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敢与任何强大的敌人斗争到底；作为伟大的谋略家，他有超人的智慧，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以彻底的革命手段，粉碎敌人的梦想与骗局，从而使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① 对于敌人，不要指望它发善心，讲慈悲，只能彻底把它斗倒，并踏上一只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反映在他的谋略思想和谋略实践中，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

是坚决反对和摒弃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而主张兵不厌诈出奇制胜，坚决反对西楚霸王式的沽名钓誉，而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1948年末、1949年初，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要出花招，伪装下野，企图用“和谈”的缓兵之计来巩固江南残存的半壁河山，以便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亲笔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他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绝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伤，然后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他引用了古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提醒人民不要做寓言中的农夫，怜惜毒蛇一样的恶人。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蒋介石集团黔驴技穷，所有的骗局均以破产而告终。

第三，进步力量战胜落后力量，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毛泽东曾说过：“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①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审历史机运，度天下大势，筹谋划策，看得深远，看得透彻。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468页。

会，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这就从宏观上、本质上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因而，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不管反动势力的气焰如何嚣张，不管历史长河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流和漩涡，他始终坚信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进步必然战胜反动。也由于他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因而看清了“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特别是在中国，敌强我弱，革命征程更不可能一帆风顺，径情直遂。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谋略思维，使他能在困难时看到光明的前途，在挫折中看到胜利的希望，始终保持必胜的革命信心，在困难的条件下有所作为。毛泽东火一般的革命激情和冷静的理性思考、革命的坚定和策略的灵活，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像一块合金钢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谋略艺术刚柔相济，极富韧性。

二、全局性

（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一大特点，就是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也更深些。他以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刻苦求学，上下求索，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顽强地磨练自己，在茫茫的黑夜中不懈地寻找指引自己到达理想彼岸的真理。加上他的天分，造就了缜密的战略头脑和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因而能够机敏地洞察局势，做出高人一筹的谋略决策，引导中国的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团成员谢伟思曾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很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①

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中国的革命在它前进的过程中，曾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围剿，而且革命力量同反动势力比起来，在开始时要弱小得多。这就决定了革命的力量要生存，要发展，只能采取“以迂为直”的路线，而不能和敌人硬碰硬。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盲目照搬马列的经典和外国的经验，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却站在历史的潮头，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不失时机地为革命指明了航向，起到了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作用。

毛泽东最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和“上山”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开拓。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举行武装

① 转引自《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10页。

起义，但在“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仍然坚持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企图借此“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行动受挫后，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力排众议，放弃了继续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几经转折，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了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这一英明决策和伟大创举，成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性开端。

由于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态势极为悬殊，使得中国革命的征途险恶，前途难卜，于是有人迷茫，有人徘徊。毛泽东则善于在这前途难卜的风云变幻中，根据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规律，预见形势的可能发展，并据此做出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决策，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经过强弱转换，赢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人散布“亡国论”，有人鼓吹“速胜论”；毛泽东却英明地指出，日本的强是相对的，强中有弱，我们的弱也是相对的，弱中有强，算定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由此提出了“持久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

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使我之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越战越强；而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短处不断暴露，逐渐由强变弱，最终归于失败。

毛泽东有着深邃的洞察能力和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在观察事物时，具有一种罕见的、不受枝节缠绕而直接把握本质的本领。这使他比别人能更迅速地领悟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及时而恰当地做出谋深计远的战略决策。当出现双方都可以利用、谁抢先一步谁就可以争得主动的微妙局势时，毛泽东善于及时果断地做出决断，力争先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处于“真空”状态，谁抢先控制东北，谁就能在以后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立即做出了“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的决策，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和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取了先机之利。当着形势渐趋有利时，毛泽东善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积极促进形势的有利转化。1948 年 6 月，解放战争经过两年的作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军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还劣于敌军，但战斗力已大大提高，且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敌人的五大战略集团分别被我军牵制在五个战场上，完全陷于被动，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毛泽东毅然抓住这

个有利时机，适时组织了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最后本钱。当形势可能逆转时，毛泽东善于及时觉察这种可能，并采取妥善的应变措施。1950年7月，正当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和土地时，毛泽东即预见到形势即将逆转，果断地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部署在鸭绿江北岸，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需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帝侵略的任务，为日后我志愿军迅速入朝参战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当危局迫在眉睫时，毛泽东善于当机立断，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摆脱危局。他在历史上曾多次指挥部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如秋收起义时果断地停止进攻长沙；长征途中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解放战争初期指挥中原突围等等。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这些紧要关头，及时果断地做出正确的决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党和人民公认的领袖，主要的不在于他的资历，也不在于他的学识，而在于他每每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做出正确的谋略决策，力挽狂澜于既倒，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才能和独特的领袖魅力，因而为全党全军所折服并衷心拥戴。

（二）统揽全局，把握枢纽

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

战斗，这是毛泽东用兵打仗的突出特点。所谓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抓住枢纽部署作战，是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提出来的，但这一思想早已有过运用并贯彻始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组织五个主力师“围剿”陕甘边区，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敌企图得逞，则东面的阎锡山和西北的马鸿逵将趁火打劫，北面的傅作义将乘机出兵南下，坐山观望的另外一支国民党部队也可能乘人之危。如此，将陷我于不利境地。怎么办？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唯一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歼其猖狂强敌一部，震慑警策其余。在具体部署上，置东面弱小而警惕之敌（一个师）于不顾，集中主力于直罗镇地区伏击西面强大而骄狂之敌（四个师）一部，一战全歼敌一个师，又乘胜击溃其另一部，一举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另外，在关系全局的决定点上，毛泽东注重建立作战重心，加速战局的发展。他指出：“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这里强调的仍然是抓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胜利。主要矛盾的解决，能够立即引起其他矛盾的急剧变化。关节点上的胜利，可以有力地推动和加速整个战局的进程。如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毛泽东指挥三路大军，千里跃进，两翼牵制，中间直掏敌人胸腹，使敌人陷入完全被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从全局出发，紧紧抓住锦州这个关节，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整个辽沈战役的问题迎刃而解。

（三）照顾局部，推动全局

毛泽东特别注意站在全局的高度，关照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筹好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因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①，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两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只有使组成全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成为一个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才能增强我之合力，并以整体的协调之势来遏制敌人的优势，从而争取主动，创造有利形势，最大限度地确保全局的最高利益。拿"三大战役"来说，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及相互联系，首先选择对我最为有利的东北战场开始与敌进行战略决战。为就地全歼东北蒋军，毛泽东命令华东我军暂不要打大歼灭战，以免引起东北敌人退缩增援，同时以华北军区部队钳制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增兵东北；在战役部署上则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从陆上关死了东北大门。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沈战役尚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又酝酿了淮海战役，决心首先完成中间突破，同时以一半以上兵力从东、北两面威逼徐州，使其"不敢以全力东援"。辽沈大地凯歌高奏，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华北敌人受到震动，成为惊弓之鸟，去留举棋不定。毛泽东果断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再打一个平津战役，实现将国民党的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为了稳住和抓住华北敌军，毛泽东采取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并令华北我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提前入关，出敌不意。待敌人查明我军企图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欲逃无路，欲守不能，终于全部就歼。

三、民主性

坚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用兵作战的常用方法。他总是虚心向群众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发现经验，发现智慧，再加以更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善于海纳百川，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真知灼见。他的这种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交相辉映，从根本上保证了谋略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一）善于集中领导集体的智慧

毛泽东常说，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一个好汉要

有三个帮。我军的许多重大战略决策都是首先由集体讨论，最后再由毛泽东拍板的。比如战略决战，就是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的；三大战役也是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协助下完成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置，如对林彪关于不打锦州，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等，毛泽东起草好复电后，都亲自批示先送朱、刘、周、任征求意见后再发。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当时身为军委副主席兼代总长周恩来的军事才能，经常亲自到周恩来的住处，与之亲切交谈，反复磋商。对各方来电，除最紧急的直接送毛泽东阅处外，一般是周恩来加以汇集，有的提出处理意见，再上报毛泽东。受毛泽东的委托或在他休息时，周恩来有时也为军委起草电报指示，待毛泽东阅示后发出。三大战役期间这样的电报约有40多份，其中关于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彻底歼灭的构想，以及为实现上述方针而要求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建议等，都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和他的主要助手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配合和协作，既加强了中央军委集体领导的权威，也保证了谋略决策的及时正确，有力地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二）善于采纳各级将领的意见

毛泽东在进行谋略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时，十分注意发扬民主，除征询领导集体意见外，还经常征求下级将领的意见，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哪怕

是相反建议，从中吸取有益的见解来完善自己的决策方案。上自战略方针的确定，下至具体方案的形成，都常常是这样。他曾说过，要先向下级学习，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示，然后再下命令；各地如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发号施令。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挺进东北决策的确立，是采纳了黄克诚的提议；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吸收了粟裕的建议；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后，改打锦西和葫芦岛为打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则是听取了曾在打锦州问题上一度犹豫徘徊的林彪的意见。1948年1月，毛泽东电示粟裕，要求他带领三个纵队南渡长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任务，把战争进一步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中原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策应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发展战略进攻。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我军渡江南进并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人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还会因我10万大军过江而更减少中原我军的力量；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继续留在中原作战，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极为重视，立即回电召陈毅、粟裕去城南庄中央军委驻地，亲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详细听取了陈、粟的汇报，并当即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最终采纳了这个方案。粟

裕果然不负众望，从中央回来后就组织了豫东战役，一举歼敌9万余人，协同刘邓大军很快打开了中原战局。这一将帅协谋的事例生动地表明，毛泽东的预见和决策，是下级定下决心、提出建议的重要依据；而下级的意见和建议，又往往是毛泽东修改预定计划、实行正确指导的重要补充。由于毛泽东高度尊重下级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既充分调动了下级的积极性，又切实保证了谋略决策的正确性。对下级的建议，毛泽东并不是一般地“照准”，而是从全局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有时是与领导集体共同商量，再做出更符合实际、更全面的定夺。

（三）善于听取基层群众的主张

听取基层官兵和群众的正确主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十六字诀”的形成，就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从井冈山以前的山大王朱聋子和官军打圈子的故事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先是总结出“敌进我退”，以后又逐渐加上了“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内容。周恩来也说：“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走，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他还说，“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①] 毛泽东对这种做法作了科学总结，指出：“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②] 这样，我军的作战指挥就能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战士因为正确意见得到了重视，战斗热情也就更加高涨。

四、灵活性

（一）重视诡道

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很重视运用“诡道”，并把“诡道”作为谋略运用的重要方面。

一是从认识路线上，肯定了在革命战争中运用诡道的合理性。在中国军事史上，自从《孙子》明确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谋略原则之后，一切进步的、务实的军事家无不奉为至理名言并加以继承发展。例如，《韩非子·难一》就提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膑兵法·威王问》指出：“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曹操也强调：“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他们都主张在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事斗争中必须用奇施诈以战胜敌人。在诈谋奇计这个军事谋略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古代一些宋襄公式的人物侈谈仁义道德，主张对敌人“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推人于险”等等，反对诈谋奇计。然而，这些“仁人之兵不可诈”的主张，已被千百年来战争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诡道——这个反映了一般战争规律的军事谋略原则，还适不适用呢？换句话说，我们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战争中能不能运用诡道谋略呢？这是认识路线在军事问题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①]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批判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就表明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战争中，是可以而且必须运用诡道谋略的。毛泽东认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我敌两军相争，犹如武松打虎，“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对敌人只能冷酷无情、坚决斗争，讲不得半点“仁义道德”，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而为了消灭敌人，在军事斗争中运用诡道谋略，施用权谋诡诈、欺骗利诱等手段就是完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0页。

全必要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之理的。正如刘伯承元帅指出的：“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如果军事行动不秘密不诡诈，则不能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就不能达到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毛泽东从认识路线上肯定在革命战争中运用诡道的合理性，为党和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放手运用诡道谋略去战胜敌人奠定了认识基础。

二是从解决以劣胜优难题的高度，阐明了在革命战争中运用诡道的必要性。如何以劣胜优，是中国革命战争最困难的课题。而要解决这个课题，在主观指导上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二是有意地“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弱的因素逐渐减少，强的因素逐渐增加；才能使敌军强的因素逐渐减少，弱的因素逐渐增加，而最终实现我由弱变强，敌由强变弱。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巧妙地运用诡道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

件事情。”

实践证明，在战争指导上通过运用诡道谋略，有意地制造敌人的错觉，人工地制造弱敌，是促使强弱互换、优劣转化的有效办法。因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敌人摸不清我真实意图，无从知道我将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对其实施攻击，不得不被我牵着鼻子走，从而使其由主动变被动，由集中变分散，由占领有利地形变为脱离有利地形，由总体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这就便于我出其不意地将其歼灭。总之，毛泽东是把诡道谋略作为促使敌我强弱转化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的，这就把诡道谋略的运用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三是从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上，强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运用诡道。革命战争与一般战争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其正义性与革命性。由于它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因而可以动员组织最广大的群众投入和支援战争。正是基于革命战争的这一特殊性，毛泽东强调要善于依靠人民群众运用诡道谋略，这一点也是毛泽东的诡道谋略与历史上一般的诡道谋略的根本不同点。毛泽东在谈到诡道谋略的运用时，明确指出：“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充分证明，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军成功地运用诡道谋略的基础。

（二）示形调敌

迫使敌人不得不听从我们调动，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艺术表现之一。而能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巧妙示形而奏效。示形是通过隐真示假，有计划有目的地制造种种假象或现象，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其目的是隐蔽自己的企图，配合造势，迫敌就范。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由于能巧妙示形，因而能牵着敌人的鼻子，叫它向东就向东，叫它向西就向西，使其听我调动。这种对示形运用之绝妙，连敌人指挥官也都惊叹不已。具体讲来，毛泽东的示形调敌艺术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摸准敌人心理因势利导。指挥员决心的形成，常常受其心理因素的制约。示形作为一种伪装欺敌活动，也只有紧紧抓住敌人的心理特征——企图欲望、思维方式等，才算牵住了“牛鼻子”，才能达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7～460页。

造敌错觉，进而导致其错误行动的目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能准确把握敌人的心理特征，作到“料敌如神”，所以能像孙子讲的“为敌司命”，达到“形之，敌必从之”的效果。为了准确地把握敌人的心理特征，我军十分重视敌军研究工作，多渠道进行战略、战役、战术侦察，注意从敌人的报纸、缴获的敌人电文和信件、俘虏的口供乃至私人日记中，寻找资料。因此，不仅对敌人的企图、部署、兵力、装备和行动规律了如指掌，而且对敌主将的派系、出身、履历、作战特点、指挥水平，以及他们的脾气、嗜好、身体状况、性格特征都掌握得非常具体。这就为有的放矢地运用示形调敌谋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针对不同敌人的不同心理特征因势利导。在我军作战的对手中，日军的心理特征与国民党军队的心理特征不同，国民党军队中嫡系与非嫡系心理特征不同，各地方杂牌部队的心理特征也不相同，不同的指挥官其心理特征更是不同。因此，在示形调敌时，只有针对不同敌人的不同心理特征，因势利导，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老奸巨猾，素有“不倒翁之称”，对我军战略战术有长期的研究，要诱使这样一个对手犯错误很不容易。我军在上党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阎锡山军队“重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的弱点和他在抗战胜利后急

于实现取代日军占领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战略的心理，采取“攻敌必救，歼其救者，诱敌与我野战”的谋略，通过围城打援、打援夺城和消灭突围逃窜之敌三种方式，将阎军13个师35万人全部消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我军诱至野外，在野战中歼灭的。

针对战争不同阶段敌人的不同心理特征因势利导。战争初期，敌处优势主动，容易骄纵轻敌，加上他们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往往有一种急于求战、急于求胜的心理；随着战争的发展，在他们吃了一些苦头，碰了一些钉子后，又容易产生不服气和急于寻机报复的情绪；到了战争后期，敌人元气受挫，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慌、犹豫，有的可能要孤注一掷，垂死挣扎，有的可能要寻找退路逃跑。当然，这只是讲的一般情况。在战争不同阶段，敌人的心理又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的。因此，在示形调敌中只有针对不同战争阶段敌人的不同心理，因势利导，才能达到目的。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正值敌重点进攻阶段，胡宗南骄横异常，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妄图速战速决。毛泽东针对敌人此时的心理状况，采取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在陕北高原上转圈子，创造了有利战机，赢得三战三捷的胜利。而到了1949年6月下旬，在我胜利进军大西北的形势下，同是一个胡宗南，其心理状态与两年前已大不相同。

为了将胡宗南主力歼灭于陕中南，如何稳住它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在部署“扶郿战役”时，针对胡宗南“举棋不定”的心理状态指出：“为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同时针对胡宗南企图借助“二马”联合抗我进攻的心理，我军采取“钳马打胡”的方针，从而使胡匪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结果，我军仅经4天作战，即歼敌4万人，解放了陕中地区。

第二，善于示形而又无常形。示形，古人有过许多论述，如孙子讲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然而，这些都是一般原则，若指挥员只懂得一般原则，只会按常规示形欺敌，那就难以“取信于敌”；而敌不信我所示之形，也就难以诱它上钩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中示形调敌所以能每每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善于灵活示形，不拘一格，变化莫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敌人难以判断出我真实意图，从而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地上我圈套。

“声东击西”是毛泽东常用的一个示形调敌谋略，敌人也深知这一点。但毛泽东对“声东击西”的运用每次都有其特点，因而使敌人总是摸不清我军“声”的哪个“东”，“击”的又是哪个“西”，结果总是上当受骗。像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

江作战中，毛泽东连续几次运用“声东击西”，且每次都获得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每次运用都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第一次，“声”的是西进扎西、吸引敌人，“击”的是重返贵州，遵义战役；第二次，“声”的是北渡长江，吸引敌人，“击”的是甩掉敌人，再入贵州；第三次，“声”的遵义徘徊，吸引敌人，“击”的是三渡赤水，甩掉敌人；第四次，“声”的是东进湘西，引诱敌人东调，“击”的是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第五次，“声”的是进攻贵阳，惊吓蒋介石，“击”的是迫蒋调滇军护驾，开辟我西进通路。像这样针对敌人不同心理状态，具有不同内容的声东击西，敌人怎么能不上当呢！

第三，勇于创造调敌新法。示形调敌的谋略方法很多。诸如：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欲擒故纵、瞒天过海、无中生有、金蝉脱壳等等。对此，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娴熟地运用。同时，他们还善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示形调敌的谋略新法。像上面讲到的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还有诸如蘑菇战术、外线出击等等。

蘑菇战术，是指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利用良好的群众条件、有利的地形和具体的敌我态势，同敌周旋，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有把握地加以歼灭的谋略。蘑菇，本是一种食用菌。人们常取其谐音，引申为故意纠缠，磨时间，促消耗。毛泽东取其引义，把上述

谋略喻为“蘑菇战术”实在绝妙。这一谋略是毛泽东1947年3月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提出来的。胡宗南集团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就是运用这个战法，隐蔽自己，调动敌人，与敌周旋，使敌在茫茫的陕北高原跨沟过河，翻山越岭，拖得精疲力竭，断粮断炊，进而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外线出击，是指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由根据地内作战转到敌占区作战，以吸引、迫使敌人撤离对我根据地之包围的谋略，它是“围魏救赵”谋略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创造性发展。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①，就是“外线出击”谋略的具体体现。

（三）随机应变

敌变我变，随机应变，是毛泽东灵活用兵的又一重要方面。我军的三次反“围剿”作战，就充分体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19页。

现了这一点。第一次反“围剿”，敌人采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张辉瓒趾高气扬，一路冒进。毛泽东当机立断，转移兵力，于龙冈设下天罗地网，一举全歼张辉瓒师9000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第二次反“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战法，毛泽东采取由富田向东横扫，成功地在狭窄的间隙中“钻牛角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身后，最终“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打破了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敌人尽遣精锐30万，“长驱直入”企图将我军压迫于狭小的地域一口吃掉。面对敌人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我军先避敌锐气退到根据地的后方，再从敌人的间隙当中绕到后面，使敌人扑了个空。等到敌回过头来，我军则乘机歼灭其疲劳的一部。通过多次穿插，先后击溃敌3个师，歼灭10余个团，再一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四）善出奇兵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是毛泽东用兵打仗的又一重要特点。被毛泽东本人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就是突出的一例。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在泸州至宜宾间渡江北上。一渡赤水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川军云集川黔边境，沿江布防，敌薛岳部又从湖南赶来。毛泽东果断地放弃北渡长江的

意图，突然挥戈东指，二渡赤水，再下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正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人马急急杀奔遵义之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然西进，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在云、贵、川边境构筑封锁线。毛泽东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着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东来“保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蒋介石的脉搏，利用他急于消灭红军的心理，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终于调出滇军，然后再次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趁敌人云南兵力空虚之际，直逼昆明，吓得龙云急调民团云集城下，红军却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回师北上，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写下了长征史上神奇的英雄史诗。还有转战陕北也是如此。面对胡宗南20多万大军气势汹汹的进攻，毛泽东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让敌人背上了一个包袱，也助长了胡宗南的骄狂气焰。此后他采取“蘑菇战术”，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指挥仅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的高原深谷之间作武装大“游行”，使其陷于十分疲劳、十分饥饿的困境，打又打不赢，撤又撤不走，我却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咬它一口，先后经“三战三捷”、沙家店、宜川等战役，歼灭了敌人10多个旅。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曾惊叹：“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

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五、创造性

刘伯承元帅说，同样一部《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和孙膑同师鬼谷子，但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就不是。王明跟毛主席都同样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就不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开拓、推陈出新的创新史。

（一）不守一术

毛泽东统军作战的突出特点，是“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①]，而不是拘泥于古书上是怎么说的、前人是怎么做的、上一次作战是怎么打的，一切是因时、因地、因敌、因我等情况的发展变化，而采取切合实际的打法。比如，“诱敌深入”是我军打破敌人“进剿”、“合剿”和“围剿”的重要原则，但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又适时提出了“外线作战”的思想，既坚持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同时也视情况积极地跳出内线、打到外线；在攻城与歼敌问题上，视力量的大小和作战目标的需要，或以攻城为主，或以攻城为“幌子”而主要地诱歼来援之敌，

① 《朱德选集》第168页。

或攻城与歼敌并取；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先后提出“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对于加速革命战争的进程，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不唯兵书

毛泽东十分重视向古人、向外国人学习，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不被前人或他人的成功经验和认识所束缚，而是善于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提出自己的创见。比如“集中兵力”问题，古今中外的谋略家都是坚持兵力要集中，没有讲要分散的。但毛泽东却提出了“集中以应对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主张，对集中与分散加以辩证地统一。再如，抗日战争毛泽东所主张的“持久战”，自古是兵家大忌，因为古人都讲“兵贵胜，不贵久”，主张兵贵神速，鲜有讲要持久作战的。而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反其道而行之，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战”这样一个最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战略方针。据说“持久战”方针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重视，并向蒋介石作了推荐，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把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通令全国，作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三）不循常法

善用奇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使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敌以突然的打击，是诡道谋

略运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是善用奇兵的谋略大师，他指导我军作战从来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这种完全主动的作战策略，不拘一格，没有固定的章法，总是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首先，在出敌不意的时间转入进攻。准确地把握进攻的时机，是作战指导的一个重大问题。过早，条件不成熟，可能导致失败；过迟，则会贻误战机，增加困难。根据一般战争规律，由战略防御转入的战略进攻，通常是在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实施防御的一方粉碎了对方的进攻，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后才开始的。而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个常规，我军的战略进攻是在敌人全面进攻被粉碎，但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仍优于我军，且倾力对我实施重点进攻，解放区重镇延安、临沂、张家口仍沦陷在敌人手中，形象的说是在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开始的。在这种形势下敢于转入战略进攻，是出敌意外的。而这正是由于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洞悉转入战略进攻条件已基本成熟而作出的出敌不意的决策。毛泽东透过敌我力量对比，敌仍占优势和敌仍处战略进攻态势的现象，深刻地洞察到：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蒋管区内形成了第二条反蒋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为我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群众基础；战场上出现了对我转入战略

进攻的有利态势，敌人的战略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其所处的“哑铃”式态势，有利于我实施中央突破；我出敌不意的转入战略进攻，可以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迫使其放弃“重点进攻”转入“全面防御”，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形势。一句话，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如刘伯承元帅指出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其次，在敌意想不到的空间实施进攻。从出敌不意的地点、沿着出敌不意的中线、向出敌不意的目标展开进攻，是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施战略进攻的突出特点。在这个战略大手笔中，有三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从哪里突破黄河天堑？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渡河地点选定在临濮集至张秋镇之间150公里的河段上。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不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我军在此突破，是敌人意想不到的。第二，从哪里组织开进？黄泛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黄泛区宽达30公里，遍地积水污泥，浅则及膝，

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蒋介石以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我竟把黄泛区作为开进路线。为了争取时间，把尾追的敌人甩得更远，我军指战员不顾敌机轮番轰炸袭击，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在烈日当空的酷暑季节，硬是通过了黄泛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我军歼灭于黄泛区的美梦。第三，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区，这又是出敌意外的。因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在蒋介石看来是他的“卧榻之旁”，共军是不敢深入至此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大别山对我来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军占据大别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可以调动蒋介石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目的，而且这里又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还是一块老根据地，我们容易立足生根。实践证明，上述选择是正确的。

再次，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实施进攻。按照一般战争规律，战略进攻都是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法。但是毛泽东指示我军实施战略进攻，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这种超出常规的决策，完全超出敌人的想像，顿时使敌手足无措，方寸大乱。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运筹方法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刘邦对智囊人物张良的赞誉。历代的大谋略家，无不以运筹帷幄见长的。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源于正确的谋略运筹方法。

一、主客符合，因情措法

根据战场内外客观实际运筹谋略，使主观指导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是毛泽东运筹谋略的突出特点。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可能从马列的著作或他人的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善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全局利益的需要，借鉴他人的经验和书本的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因而更快更好地把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进而作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谋略决策。这一点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有口皆碑，称赞毛泽东"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①]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叫做"指挥员正确的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第32页，宋时轮。

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①] 因此，他在进行谋略运筹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将调查得来的、甚至是别人习以为常的材料加以全面的客观分析和比较，权衡利弊，进而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措施。他尊重别人的经验和书本的理论，却又不受其束缚，而是注重联系实际，因时因地而宜，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发挥。

我军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历史，也是毛泽东因情措法指导战争的必然结果。他批判地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产阶级在领导武装起义之后转入战略防御，即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②]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对比强弱悬殊这一特殊情况，认为革命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而不是如何通过不断地进攻来防止反革命的反扑，因而毅然在秋收起义之后，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3卷第150页。

略防御作战的实践，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

将积极防御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在国外，积极防御只是一般的作战原则，指的仅是防御作战当中的攻势行动。毛泽东却根据中国的实际，将这一原则用于战略指导并加以具体化，根据不同的战争时期或阶段敌我情况和作战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内容的具体战略方针，如1930年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1937年对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1946年提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方针等等，就是毛泽东根据不同情况创造性地指导战争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还善于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和近代西方的军事理论，不但做到了推陈出新，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作战样式和战法。比如诱敌深入、蘑菇战术、外线出击等等，都是毛泽东的首创。

朝鲜战场我军扬短抑长，放弃拿手的运动战，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打堂堂之阵，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迫使美国侵略者坐到谈判桌上，则是毛泽东在当时当地条件下的又一个创举。在敌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情况下，我军在固定的战线上同其对峙，的确是一种超出过去传统经验的决定。正是

因为毛泽东不拘泥于传统的作战形式和过去的拿手好戏，善于根据战争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变换战术，所以常有惊人之举，往往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人们常用“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来形容毛泽东的谋略艺术，而这正是毛泽东因时因地因情因势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因而使自己的谋略总能符合客观实际这样一种运筹艺术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曾根据不同时期敌我力量消长的不同情况，筹划了三次不同的军事战略转变，即土地革命时期由前期的主要是游击战争转变为后期的主要是正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由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为国内正规战争。同一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毛泽东也善于根据敌我情况的发展变化，制定不同的战略方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采取的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的方针；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辅之以运动战和阵地战；战略反攻阶段又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但阵地战上升到重要地位，以游击战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战略配合作用的方针。战略的指导是这样，战役、战斗的指导也是这样。比如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为就地各个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依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是“关门打狗”；淮海战役是“中间突破”，尔后“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平津战役

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然后“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历次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是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既善于从宏观上、总体上分析研究，把握战争规律，又善于洞察每次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实事求是地赋予新的战略任务，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巧妙地推动战争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逐步转化战争形势，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不断地把战争引向胜利，生动体现了他高超的谋略运筹艺术。

主客符合、因情措法的运筹方法，不但表现于依据实际情况定下决心，而且表现于在实现决心的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时地改变决心。他说过“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 抗美援朝战争中，初期毛泽东原定“只打防御战”，但我军入朝后战场形势已急转直下，由于敌人长驱直入，分兵冒进，我军已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的防御地区，且敌人完全没料到我军会出兵参战；鉴于形势的这种变化，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定的计划，决定立即反击敌人，出其不意，连续发起了第一、第二次战役，将敌人驱赶至“三八线”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4页。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已形成均势的实际情况，及时确定了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目标，毅然取消了原准备以运动战方式进行第六次战役的计划，转而采取了我军过去曾长期避免的阵地战的方针，并由以军事打击为主变为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相结合，经过两年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以打促谈，终于迫使敌人停战求和，胜利地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毛泽东善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及时恰当地变更既定的决心，因而能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全局的运筹是这样，局部的运筹也是这样。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派我军主力部队争夺东北时，最初确定的方针是“独占东北”。进军东北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企图独占东北是不可能的，于是果断地改为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此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回到“大路”上进行四平保卫战，直到四平防线被敌突破，我军撤到松花江北以后，才最后将战略重心放在东北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建立根据地，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战争更是急剧变化的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因此，任何天才的指挥员，在战争的发生之前，都不可能完成对这场战争的规律的完全认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

在于，他善于在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经过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逐步完善对这场战争规律的全面认识，使自己的主观指导愈来愈符合实际。

毛泽东尽管重视主客符合，但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差错。毕竟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他运筹决策从不失误，在于他能尽快地觉察并改正他的失误，而不是死抱着原来的方案不放。比如在作战指导上，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放弃他原来的主张，而采纳下级的意见；也曾不止一次地依据客观实际的发展，修正自己过去的决定。这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崇高威望，反而更生动地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曾一度想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此时粟裕根据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的分析，却提出了实行“内线作战”的建议。毛泽东慎重考虑了粟裕的建议，根据敌情新的变化，果断地将原定的战略方针调整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个调整对指导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辩证思维，先预后立

人们常用“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形容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运筹艺术。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他善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谋略运筹，并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二是他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基本观点出发，高度重视对战争形势、战场矛盾、发展趋势的预判和分析。而且毛泽东在运筹谋略时，又常常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总是能看得更高、更远、更深一些。

（一）透过现象抓本质

克劳塞维茨曾提出：“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在极复杂的战争中只有以敏锐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毛泽东就是善于抓住本质预见未来的大师。

首先，他善于通过分析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本质。他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土地革命初期，革命力量弱小，许多同志一遇到败仗，或被四面包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暂时的特殊的不利情势扩大化，仿佛全国的形势都不乐观。对此，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是由于没有观察实质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造成的。只要从本质上去详细地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就会得

出"星星之火"距"燎原之势"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其次，他善于抓住战争进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揭示本质。例如，1942年10月毛泽东在分析二次大战形势时，就紧紧抓住大战的主战场——苏德战场和反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红军的斗争形势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意义，揭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了希特勒转向灭亡的转折点。他指出许多人之所以看不清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再次，他善于通过区分在战争中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揭示本质。例如，他在分析解放战争初期的形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二）高屋建瓴判形势

毛泽东作为驾驭中国革命战争全局的战略家，他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预见未来，做到在审度全局时势时，坚持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各方面的情况，从其内在联系上对时势作出正确判断；在对影响全局的各局部和诸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时，注重搞清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局部和因素的情况；在审度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势时，注意把中国放到世界这个大局中去研究，把握世界时势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影响。他认为，只有"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抗日战争初期，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形势是党内外、军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不断沦陷的严重局面，许多人对中国前途感到失望。而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告诉人们，抗战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因为他在审度抗日战争"时"、"势"时，首先对中日双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找到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样四个互相矛盾的特点，说明中国不会灭亡。其次，对影响战争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抗战力量进行了重点分析，强调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

验”，特别是有了共产党这个“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这是中国抗战一定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再次，把中国抗战放到世界历史时代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去研究，指出“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

（三）着眼发展作预见

科学预见，是毛泽东高超谋略运筹艺术的突出特点之一。他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他强调，“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是善于对战争进行科学预见的。

第一，他善于根据战争中敌我力量的消长进行预见。毛泽东认为，正确的预测未来必须做到“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的预见，就是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变化的准确估算而得出的。例如，1948 年 11 月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

据对敌我力量变化的新统计，指出“中国的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从而预见到，“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 1947 年 7 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后来，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第二，他善于依据对抗反应论的原理进行预见。所谓“对抗反应论”，是指战争双方在对抗中，一方的行动必然引起另一方相应的行动的规律。依据这个规律，对作战行动的前景和发展趋势作出推断、预见，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例如，1947 年 6 月，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就根据对抗反应论，判断了敌人将拼命与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的种种可能，预计了我军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从而告诫刘邓大军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第三，他善于用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进行预见。例如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所以能预见到全面内

战必然爆发，就是因为他对蒋介石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的结果，他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的，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预见是历代谋略家所极为重视的，也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钥匙。毛泽东的预见用"神机妙算"来描述并不过分，但他一不是靠天才，二不是靠时运，而是依靠扎扎实实的辩证思维。

三、谋势造势，先胜后战

谋势造势，是战争指导者在敌对双方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谋求和占据那些能增强自身能量的空间位置，主动地创造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场环境、格局和态势。谋势造势旨在使自己的力量增值，并争

取和保持战场上的主动权和自由权。就是说，谋者是利用"势"之道，达到"任势取胜"之途。谋势造势在毛泽东军事谋略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重视谋势造势，而且善于谋势造势，把谋势造势的活剧演得有声有色。

（一）谋先胜不败之势

谋略家造势定策，首先在保证自己利益不丧失的基础上，去争取更多的利益；在保证自己不被敌人打败的前提下，去创造条件战胜敌人。《孙子》讲的"先为不可胜"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劣势装备的弱小之军来讲，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弱军对强军作战，不可能马上置敌于死地，得首先考虑如何创造一个保存自己、站稳脚跟的"自保势"，再图赢得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我军力量十分弱小。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1页。

看到，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十分重视创造保全自己的态势，以求不为敌所制。其方法有：

第一，谋求可靠的“民势”。“力量小但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但反人民的，弱”，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弱小的革命力量，要创造有利态势，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与人民群众结合。为此，我军必须把立足点——革命根据地，选择在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地方。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不是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这些省份“是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一句话，这里有觉悟较高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践也充分证明，有了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人民群众，我军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①

第二，占据有利的“地势”。常言道：“人往高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4页。

处走，水往低处流”。前者是讲人们为求生存、谋发展，就要积极争取高位势；后者可比喻为力量处于高位势，不仅能量可以增值，而且便于向低位辐射，制约低位。毛泽东认为，“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因此，他把“以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作为选择根据地的条件之一，强调“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中国工农红军上井冈山就是占据有利地势的典型例子。毛泽东讲：“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为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围250余公里，回旋余地大。进可发展革命力量，退可保存革命力量。而且这里处于湘赣交界，“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①

第三，营造有利的“战势”。谋取了有利的“民势”和“地势”，还必须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力量谋求有利的作战态势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攻势和守势都是为达成这一目的采取的战势。但前者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通过消灭敌人来更好地保存自己；后者则是直接为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必要手段。毛泽东强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战略上必须实行防御，而在战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页。

战斗上应创造条件实行进攻；在强敌进攻面前，必须实行战略退却，他把战略退却作为“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选择了具有良好“民势”和“地势”条件的根据地作为依托，积极营造有利的“战势”，指导我军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的方针，使我军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二）谋局部有利之势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优者胜，劣者败。无论是战役战斗还是战争的最后结局，如果没有压倒对方的优势力量，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然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运用优胜劣败的规律去实现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指出：“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

动。”[①] 这就是说，弱军在战争指导上可以而且必须运用优胜劣败的规律，按照战争的实际情况，在全局的弱中造成局部的强，从而在局部实现以强胜弱的胜利。即要“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这里，毛泽东从宏观上清晰地阐明了弱者战胜强者的方法。具体说来：

第一，要善于集中自己的兵力，以集中之势对分散之势。孙子讲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膑也曾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否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因此如何集中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兵力，便成为造成战役战斗我优敌劣的一个重大课题。要达成分散强军的目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首先在战略上实行必要的分散。只有以自己的小分散，人为地造成敌人的大分散，才能在战役战斗上实现以己之集中对敌之分散，造成一向势制约多向势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想打通华北，抢占东北。他以三个军的兵力为一路，由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我为了保证晋冀鲁豫主力集中力量打击该敌，各解放区部队同时在津浦、同浦南段、桐柏、平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页。

绥、冀热辽等数个战略方向上一齐出击，使蒋介石分开五指全面应付，无法抽调兵力向平汉路迅速增援。这样，我晋冀鲁豫部队集中了6万野战军和10万民兵，对平汉路3万之敌形成了局部优势，吃掉了两个军，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一举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第二，要善于分散敌军，使其由全局的强势变为局部的弱势。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善于及时捉住战争矛盾展开过程中敌人暴露出来的较弱的局部。他认为，战争之初，在全局上敌人虽然是强的，但其在展开运动的过程中，分散开的各个战区、各个战略方向、各条战线、各个部队，在各种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力量总是不平衡的，总会有弱的局部暴露出来。因此，我军要造成战役战斗我优敌劣之势，必须"拣弱的打"，必须"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必须"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当我军集中力量对付这样的敌人时，战役战斗的我强敌弱之势必定十分显著，从而可以确保胜利。当然，在战争进程中，有时多路敌军齐头并进，一时强弱难以区分。这时，有意地制造敌人的错误，人工地制造弱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要善于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在局部以我之外势对敌之内势。我们把军队处于被包围的内线作战态势称为"内势"，把军队处于包围的外线作战态势称为"外势"。很显然，处于内势是被动的，处于外势是主动的，外势制约着内势。毛泽东认为，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我军蒙受着许多不利，但当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对敌实施包围迂回，处于外线作战时，就可以在战役战斗上取得外势制约内势的有利态势。为此，在谋划创造战役战斗我优敌劣之势时，毛泽东不仅注重集中优势兵力，而且强调实行包围迂回战术，我军所取得的战役战斗歼灭战的胜利，都是在集中优势兵力的物质基础上，实行包围敌人的部署，形成外势制约内势的结果。

（三）造全局协调之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战争是在多块革命根据地、多块战略区由各支主力部队同时对敌作战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种多支力量分散作战的情况，既不易形成对敌斗争的合力，又增加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性。因此，如何使分散在各战区的武装力量有机地协同配合作战，就成为运筹造势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整体效益出发，造全局协调之势。他认为造成全局协调之势，既可以从战略上分散敌人，减煞敌人的优势，使之陷入被动；又可以使我军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在战略上形成整体合力，增强我军的优势，使我争取主动，进而为歼灭敌人、转化敌优我劣的形势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毛泽东运筹造势的谋略主要有：

第一，以我之"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刘

伯承元帅在谈到毛泽东这一谋略时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面对点线的战争，而蒋介石是以点线对面的战争"，"记得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说，那时打大城市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土地分配好，它的城墙就自然倒了。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所以说，我们从十年内战直到现在，就是面与点线的斗争。我们的面越宽越好，越能包围点线。"他这里说的"面"主要是指广大农村，"点线"主要是指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这是从造势角度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象比喻。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还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都是以主要力量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形成"点势"和"线势"，而我军则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控制广大乡村。虽然就每一块孤立的根据地来讲，可能是处于敌之三面或四面包围之中，但若把各块根据地联系起来，从全局来看，我们则把敌人包围在点线上，这就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独特的"面势"制约"点势"和"线势"的宏伟态势。

第二，以我之"要穴势"制约敌之"面线势"。如同人体的穴位一样，针刺要穴，可以把患者的生命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也可以一针制患者于死地。我们把军事对抗中力量占据能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点所构成的势，称之为"要穴势"。例如，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对宿县这个点极为重视。因为宿县位于徐蚌线上（津浦线上徐州至蚌埠）上，攻克宿县就可以切断敌人退往蚌埠的通道，进而可将刘峙集团歼灭于淮河以北。1948 年 11 月上旬，毛泽东电示陈、邓、粟："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切断宿蚌路"；"务须不管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东野战军遵照这些指示，奋勇攻克宿县，"徐州十字架"上的国民党军队立即陷入了死局。又如，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对塘沽、新保安两点极为重视，他在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因为塘沽、新保安是平津战役战场上的两个"要穴"，攻克此两点，华北之敌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破坏了，敌人的退路也随之被切断。再如抗战初期我军控制太行山，解放战争战略反攻挺进大别山等等，也都是以"要穴势"控制"面势"和"线势"的光辉范例。

第三，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所谓联网势，是指战争力量在广阔的空间形成多点布局时，多点之间有畅通的信息渠道与力量机动自由，从而多点位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形成一个整体，或者各点位的力量可以直接衔接、连续起来形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整体。在战争进程中，敌对双方都力图使自己的力量布局形成联网势，因此，这对如何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毛

泽东很重视创造联网势，主要做法：一是用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统一各根据地、各战区、各部队的思想，使处于各点位的我军力量，在战略方针指导下，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二是不断地协调全军行动，使处于各点的我军力量形成紧密配合的整体部署。三是通过全军加强全局观念的教育，增强各根据地、各战区、各部队自觉服从全局，为实现全局利益和目标而主动协同的自觉性。毛泽东经常教育部队："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处于各点位的我军力量都能站在全局的高度，认清自己的行动。为了全局利益，甘愿挑重担，甚至牺牲局部也在所不惜。这样，就使我军的联网势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时，毛泽东运筹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就是一个光辉范例。

1947年6月，为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意图，毛泽东首先确定以刘邓大军从南线中央敌人薄弱部位突破，尔后经豫皖边区向大别山挺进；随后，又及时决定以陈谢、陈粟两路大军分别向豫鄂陕和豫皖苏边区挺进，以牵制和调动尾追刘邓大军之敌；并与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的布势展开，三军配合，协同作战，经略中原。同时指示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分别在陕北和山东

战场钳制敌之主力，掩护三军在中原的展开。此外，毛泽东还指示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我军，积极发动攻势，歼灭当面之敌，从战略上策应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这样就形成了中央突破、三军挺进、两翼钳制、内外线配合的联网势，从而有效地钳制、调动、分散了敌人，迫敌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被动态势。

四、独立自主，务求主动

主动权是指挥员对客观情况正确估计、正确指挥赢得的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主动权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主动权的先决条件是掌握着强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而主动权的关键则是主观指导是否高明。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多得很。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

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则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①]中心意思就是，主观指导错误，就会变主动为被动，变优势为劣势；反之，主观指导正确，弱小的军队也可以夺取和保持主动权。

作为战争指导者，要想夺取和保持主动权，就离不开“独立自主”这几个字。只有按照战争的发展规律和自己的实际，独立自主地运筹谋略、指导作战，才能夺取主动争取胜利。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每一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独立自主的谋略运筹方法。离开了独立自主，主动权也就谈不上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唯马列书本为是，唯苏联经验为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主张先攻城市；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反对运动战，主张阵地战等等。把中国革命推向绝路，不仅丧失了整个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使党和红军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仅剩的一点点红军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可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58、459页。

上是从，他客观地分析了战争指导上的失误，客观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在1939年11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说：“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①]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立即执行了，他胜利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东南局书记项英仍不愿执行，他失败了。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人被歼，项英自己亦被杀害。

保持主动、独立自主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它要求指挥员要善于排除各种干扰，不受敌人的迷惑和影响，就要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711、712页。

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① 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的一份电报说："你们……应完全不被敌人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灭之。选择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② 1948 年 10 月 4 日他在给东北局林、罗、刘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③ 我军各级指挥员在毛泽东指示下，独立自主运筹谋略，先后取得了许多重要战役的胜利。

五、多手准备，以备不虞

（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运筹作战，历来注重充分准备。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就规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06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04 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413 页。

敌我力量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还指出："凡事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敌人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少部被调动。"对每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并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应对。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后，计划举行宁夏战役，但由于西（安）兰（州）大道被胡宗南切断，红军遂主动放弃宁夏战役计划。随后又计划进行海（原）打（拉池）战役，也由于无充分把握而放弃，直到诱敌冒进，出现战机后，才于山城堡一役消灭胡宗南一部，结束了土地革命时期最后一个歼灭战。无准备不打、无把握不打、无优势不打，在这一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做出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充分准备最坏的可能，努力争取最好的结局，这是毛泽东谋略运筹的特色之一。1949 年初毛泽东在筹划渡江南进时，就充分估计到美国将直接出兵占领我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同我军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1950 年当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也考虑了美国与我公开进入战争状态，而我又不能在朝鲜境内大量歼灭美军，因而形成僵局这样一种最不利的情况，并设想了必要的对策。这些是战略上的。

在战役层次上，济南战役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争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此时，蒋介石不得不将“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当时济南是敌人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战略要点，是蒋介石借以支持华北、华东残局的战略要地之一，由国民党第2绥区王耀武所属11万余人据守，同时敌人还在徐州集结了3个兵团23个旅的重兵集团，准备随时北援济南。根据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于8、9月攻克济南，然后全力南下作战。8月26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电告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有三种可能：（1）在援敌距离济南尚远之时攻克济南；（2）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3）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同时要求“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上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8月28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又电示华东野战军：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以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1）、（2）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其目的是要求华东野战军防患未然，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华东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以7个纵队攻城，以9个纵队打援；

如援兵不来，则增强攻城力量。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17日至20日，解决了敌城外防御阵地和外围据点，23日向济南发起了总攻。援敌慑于态势，未敢轻动。24日将济南守敌全部消灭，王耀武被俘。此战役严重打击了蒋介石“重点防御”的计划，为我军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六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巧妙运用

古往今来，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不胜枚举。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贡献卓越，但在战争舞台上建树不大；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横扫疆场，可军事理论著述不多；伊尹、姜尚、张良等一代谋臣，虽妙计迭出，惜无兵书战策留于后世；司马穰苴和岳飞、戚继光等名将在建军治军方面颇有成效，但其格局与毛泽东又相差甚远。纵观中外数千年，将军事谋略的理论创造与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战争实践完美结合于一身者，首推毛泽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将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谋略与现时客观实际紧密结合，创造了举世叹服的战争奇迹，表现出极为高超的谋略艺术。

一、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巧妙结合

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喜欢运动战，不得已才搞游击战，一贯排斥阵地战。这是一种误解。根据战争形势特别是作战对象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灵活地选择作战方式，适时地进行作战方式的转换，并始终注重多种作战方式的巧妙结合，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重要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初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毛泽东主张实行游击战，因为游击战在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我国，是“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势”，这种作战方法利于发挥我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利于弥补军队弱小、装备短缺、武器破旧的劣势，利于积小胜为大胜，在持久作战中改变力量对比，改变战争形势。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一整套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作战原则，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①红军运用这些作战原则与敌周旋，取得了一个个胜利，逐步壮大起来。

运动战是游击战的高级形式，是游击队向正规部队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从事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于执行这种进攻作战而在某些必须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①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中国的版图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广大的回旋余地，是运动战天然的好战场。中国革命战争漫长岁月的基本情况是：敌人兵力强大，装备优良，数量众多；我军兵力弱小，装备低劣，正规军数量少。要不断地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不断地消灭敌人、消耗敌人，最好的战争形式是运动战。而在那种形势下，弱小的我军也只能从事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叫敌人打不着，吃不掉。毛泽东说："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期的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当敌人多了不好打时，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时，当敌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时，当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我们都是要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①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走"是手段，"打"是关键，我军的一切战略战役行动都要建立在"打"的基本点上。一旦发现敌人薄弱部分，就集中优势兵力，执行有利决战，长期下去，就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这就是运动战的奥秘。

在敌我力量处于相对均势时，毛泽东就将阵地战及时提到了议程，无论是攻城还是坚守，只要对全局有利，都不惜与敌人进行阵地战。解放战争的诸多阻击战、抗美援朝战争中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都是如此。

1952年，经过上一年的夏季和秋季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隔江形成对峙。"联合国军"为摆脱被动局面，企图以军事压力增强其谈判地位，决定在战线中部发动"金化攻势"，攻占上甘岭地区，拉平战线，进而夺取五圣山。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投入17个步兵营，在大量炮兵及航空兵支援下，进行多路多波次的连续攻击。志愿军先后投入21个步兵连，在火炮支援下，依托坑道工事，白天顽强抗击，入夜积极反击，表面阵地几度复得，得而复失。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50-7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仅战役第一天，“联合国军”便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西侧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余枚，两高地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志愿军防守分队击退对方30余次冲击，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伤亡过大，弹药供应不及，转入坑道坚持斗争。“联合国军”为夺取坑道，从10月21日开始，投入11个多营的兵力，采取了筑堡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放毒、熏烧等手段，围困志愿军防守部队。志愿军及时调整力量，增兵坚守坑道，同时集结兵力，屯集粮弹，为进行决定性的反击作准备。坚守阵地的分队在缺粮、缺弹、缺水、缺氧情况下，与纵深部队密切协同，反破坏、反封锁、反围攻，守住了坑道，大量杀伤“联合国军”。10月31日，志愿军集中13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首先向597.9高地发起反击。激战至11月1日，歼灭“联合国军”1个营又2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接着又打退“联合国军”连续6天的反扑，守住了阵地。11月11日，志愿军集中两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恢复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随后又增兵两个营，连续粉碎“联合国军”130多次冲击，巩固了阵地，至25日，“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被彻底粉碎。此役，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执行任务的志愿军分队在这个弹丸之地上歼灭了“联合国军”4.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对方的进

攻，取得战役全胜。此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因此从战役的全局和增加谈判砝码的政治需要来看，这种阵地战及其付出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

正规战与游击战，阵地战与运动战，是相辅相成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下、侧重点必须不同。中国革命战争进行了22年多，战略防御进行了20年，战略进攻仅仅进行了两年多。在战略防御前期以游击战为主，后期以运动战为主，在战略进攻前期也是以运动战为主，在战略进攻的中期即三大战役前后和后期以阵地战为主。“为主”不是“单打一”，始终有其他战争形式辅助。从中国革命战争全体上看，基本上是运动战。

总之，游击战与正规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是对立统一的。这些战争形式，毛泽东把它因地、因时、因敌、因我、因任务巧妙配合，灵活转换，更好地为战争胜利服务。

二、歼灭战，消耗战，击溃战，相互补充

作战的效果可分为歼灭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歼灭战是全部或大部分毙伤或俘敌的作战，这是人民军队战胜强敌的根本指导思想。消耗战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逐渐消耗敌人力量的作战；二是指给敌以消耗而自己也付出一定代价的得不偿失或是得失相当

的作战。击溃战是指将敌打垮或打散而没有或很少俘获的作战。

毛泽东不仅主张歼灭战，而且是歼灭战的大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实践中为我军总结、发展了歼灭战的作战思想。

1930年，当时的中央红军还弱小，红一方面军只有约4万人。10月下旬，正在清江至分宜段袁水两岸活动的我军得到情报，国民党军集中了10多万人的兵力，在驻江西的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下，分数路开始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没有分散兵力各个阻击，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向苏区内退却，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苏区人民的支援，发现和造成国民党军的弱点，尔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运动中的敌人。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少数兵力监视敌人，主力则逐次向苏区中部转移，隐蔽待机。深入苏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遭我苏区人民武装的不断袭扰，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其第18师于12月29日孤军深入，进占龙冈。我军集中主力，趁其立足未稳，包围了该敌，于30日16时发起总攻，激战至黄昏，全歼该师并活捉师长张辉瓒。这个漂亮的歼灭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我军乘胜转兵，追歼由源头东撤之敌50师，又歼敌1个多旅，残敌纷纷逃向临川。至此，敌人全线

溃逃，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从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可以看出，对于实力雄厚的敌人，只有实行歼灭战，才能奏效。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我军歼敌15万人以后，敌"围剿"兵力还剩9万余人，相对于我4万红军，仍处于绝对优势。之所以"围剿"迅速被打破，主要是我实施歼灭战对敌产生的重大影响，成建制的敌人被我迅速歼灭，使"围剿"之敌被强烈震撼，害怕遭到同样命运，纷纷逃脱自保。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我军均歼敌3万余人，分别只占敌"围剿"兵力的1/7和1/10，结果却都很快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反之，如果红军采取分路阻击的战法，凭着红军战士的英勇，苏区民众的支持，消灭几万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但对于兵力占优势的敌人来说，难以造成重大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军没有执行歼灭战的作战方针，而是分路阻击，苦战一年，虽给各路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歼敌数目也不少，终究未能打破"围剿"，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可以看出坚持歼灭战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重视歼灭战，同样也重视消耗战。所不同的是，他不是从战役战术层次上研究消耗战，而是从战略高度看待消耗战，把不断消耗敌人，看作是转变敌强我弱形势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从理论上阐明了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内在联系，给了消耗战以新的含义。

歼灭是质变，消耗是量变。战役战术上的歼灭，可以达到战略上的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战争，既是歼灭战，又是消耗战。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不断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科学确定我军歼灭战、消耗战的层次。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力量十分弱小，毛泽东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指挥红军向反动力量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挺进，用游击战的方法，不断歼灭小股反动武装，积战斗上的小胜，逐步达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目的。这是战斗层次上的歼灭战，达到了战役层次上的消耗战。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毛泽东逐步提出扩大歼敌规模，用运动战的方式，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把歼灭战发展到战役规模。这是战役层次的歼灭战，达到了战略层次的消耗战。它加速了敌战略力量的削弱，使红军力量迅速发展，猛烈地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找出了中日双方存在的各种利弊条件，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妄图假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我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①] 主张用战斗层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253页。

上的歼灭战，达到战役层次上的消耗战，进而实现战略层次上的持久战。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从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多万。解放战争我军广泛实施了战役上的歼灭战，加速了战略上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消耗，所以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歼灭战和消耗战关系的科学把握，是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试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及时地把战斗的歼灭战发展到战役层次，革命的根据地就无法迅速扩展，弱小的红军就难以发展起来，星星之火也就不会成为燎原之势；而不注意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及时完成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又会很快消耗殆尽，抗日战争就不会出现我党领导下的那种蓬勃发展的局面。至于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战的大发展，则完全是毛泽东军事谋略更趋成熟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对消耗战的本质认识，使他不但运用了消耗战积极的一面——逐渐消耗敌人，而且还创造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避免了消耗战消极的一面——消耗敌人而自己也付出较大的代价，即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消耗敌人，自己当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问题是如何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毛泽东很早就研究了古今中外以劣胜优的战例，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争

“十六字诀”，有效地解决了消耗敌人同时也给我军自己造成消耗的问题。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抗日战争我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战术，真正做到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长此以往，就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使敌人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战斗层次避免我之消耗的有效战法。在战役层次毛泽东独创运动战战法，通过运用主力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内广泛实施机动，不断调动敌人，发现敌人的弱点，把难打之敌变成好打之敌，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予以歼灭。其优点，一可全歼，二可速决。速决可以减少我之损失，全歼必有俘获，因此可以弥补我之消耗，还可以因为成建制地歼灭了敌人而加速了敌人的消耗。在毛泽东的手中，消耗战突破了传统的界线，更加具有哲学上的意义。

歼灭战和消耗战都是为了完成敌我力量的转变，击溃战又如何呢？毛泽东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人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否则便没有任何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① 在这里，毛泽东讲得很明确，一方面，孤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00～221页。

地实施击溃战，对于优势之敌，是毫无用处的。第五次反“围剿”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战役战术上就是采取的击溃战，虽经广昌保卫战等重大的作战行动，多次击溃敌人，但很快敌人又组织了新的进攻。因此，这种击溃战毫无效果，应尽力避免。另一方面，击溃战又是歼灭战、消耗战的重要补充。（有些击溃战本身也是消耗战）像运动战中的阻援作战，虽然执行的是击溃任务，但它已是歼灭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舍此无法达成歼灭的目的。因此，它是不可或缺的。

三、政治仗，军事仗，外交仗，多手并举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历来注重从政治的角度谋划军事问题，从政略的角度谋划战略问题，注重政治仗与军事仗的巧妙结合。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同政治的关系时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前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侵略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离不开政治。”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如此，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等大小战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手打好军事仗，一手打

好政治仗。

建国之初，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意见初步定下来后，决定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一征求意见，黄炎培求见毛泽东，提出“支援军”的名义不妥：“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听取了黄炎培的意见后，毛泽东略一沉思，将“支援”两字一划，改写两个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情，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这个看似简单的“冠名”问题，实际上是个能否获得国际上多数国家认同的政治性的大问题，从这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一贯的反对把战争看作单纯军事问题的态度。

军事仗与外交仗“双管齐下”，是毛泽东谋略运用的又一高明之处。打好外交仗是为了营造积极有利的外部环境，形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国际舆论；打好军事仗又有利于打好外交仗，利于争取和平。这一谋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第一，敢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不怕敌人唬骗；第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进行谈判，以军事斗争的胜利促进谈判，不怕

敌人要挟；第三，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可使敌处处感到被动和压力。

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后，美方先是以所谓“谋求海空军事优势的补偿”为借口，妄想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后方，不战而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方拒绝后，敌便发动夏季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我让步，我军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迫使敌同意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1952年，美方又以战俘遣返问题进行讹诈，拖延谈判，并发动金化攻势，对我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空中绞杀战。为配合谈判斗争，我军于1952年秋胜利实施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随后又进行了上甘岭战役和次年的夏季攻势，终于迫使敌人作出让步。就在停战协定签定前，鉴于李承晚集团妄图破坏停战协定的情况，我军又发动金城攻势，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经过为期两年边打边谈的斗争，朝鲜停战协议终于签订。“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不无遗憾地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一定有同样的感觉。”①

① 《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1页，克拉克。

四、重谋势，善造势，巧乘势，因势利导

势，在军事上运用最多，亦最难把握。历代谋略家对“势”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孙子将其分为动势、态势、气势与位势。李靖将“势”分为气势、地势和因势。毛泽东本人虽然对“势”的论述不多，但他对“势”的运用之妙，还是十分少见的。

毛泽东重视谋势。他多次把作战比作下棋，说“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势为上，谋子为下。指出“指导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他认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上都有一个谋势的问题，而战略、战役部分尤其需要谋势。可以说，毛泽东几乎所有战略运筹都是围绕“势”做文章的。这在前文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还善于造势。他的造势谋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劣势装备的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创造有利的态势，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歼灭敌人。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役态势，造“先为不可胜之势”；运用优胜劣败规律，造战役战斗我强敌弱之势；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在具

体的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谋划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民势”，陷敌于全局被动的“位势”，占据战场有利地形的“地势”等。辽沈战役中，毛泽东抓住锦州这一点做文章，造成对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关门打狗”之势，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屋建瓴的宏大视角和谋势造势的高超艺术。

1948年9月，国民党东北卫立煌集团总兵力有55万人，华北傅作义集团有50万人，两大集团的联系主要靠北平到沈阳的北宁线铁路，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战略要点，像扁担一样挑着东北和华北，防守锦州地区的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指挥范汉杰指挥的10万余人。打下锦州，就可以切断东北和华北之敌的联系；如果先打长春，卫立煌集团进可以得到傅作义集团的强大支援，退可以顺利地撤往华北。针对林彪想把主攻目标改到长春这个点上的想法，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示林、罗、刘：“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①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锦州发起进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指挥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锦州攻克，“关门打狗”之势形成，战役局势顿时改观。迫于态势上的巨大压力，长春守敌1个军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辽沈战役很快宣告结束。而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我军的战略态势焕然一新，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龟缩防御。

毛泽东还巧于乘势。“乘势”是指利用有利态势，把握战机，歼灭敌人。毛泽东多有“乘势”的妙笔。抗日战争后期，当日本侵略者已成强弩之末、苏联出兵东北时，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国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不仅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了中国领土，而且人民军队乘势收缴了大量武器装备和财资，壮大了自己，扩大了解放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乘着人民解放军斗志高昂、国民党军队江河日下之势，果断地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挥师南下，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数路大军势如破竹，饮马海边，将国民党军队压缩于台湾一隅。“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把握战机、巧于乘势的过人魄力和胆识。

五、先乡后城，城乡并重，先城后乡，适时发展

提到中国革命战争，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即“先乡后城”谋略，实际上，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是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不断发展的。

中国革命以前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城市无产阶级也相对比较强大且集中，一旦城市起义成功，“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①] 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就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而建立起来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战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着城市走。大都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夺取城市不但是革命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同样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因此，当1917年俄历10月这一有利于无产阶级起义的决定时机到来时，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用迅速、坚决的起义，占领了圣彼得堡这个城市，通过直接夺取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在探寻自己道路的过程中，曾经搬用过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9页。

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首先在城市取得胜利。从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凡是围攻或固守城市的，都在敌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失败了，只有少数转入农村的起义队伍，才最终保存了下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明确提出了"先乡后城"的谋略。在他领导和影响下，红军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先后建立了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等一系列农村根据地，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长征之后，毛泽东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苏区，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此时，毛泽东依然运用"先乡后城"谋略，指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广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军对国民党正规军据守的正面战场不断实施包围的同时，我军则在敌后形成了对日军各据点的反包围，极大地改善了抗日战争中我军和友军的态势，实现了抗日战争我军持久胜敌的战略目标，我军的力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解放战争爆发时，我军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

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解放区的急剧扩大，需要

利用城市的辐射作用，将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联结成一片；同时，由于作战规模的不断增长，我军也需要城市的财力、物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将城市作战的重要性提上了议事日程。他指出，"……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①] 这就明确地将"城乡并重"谋略提上了日程。在这一谋略指导下，我军先后将几块较大的解放区联接起来，形成了华北、东北、苏北、山东、中原和西北等几个较大的解放区，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聚了雄厚的战争力量。

随着战局的迅速变化，我军已逐渐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情况的变化要求战略指导必须适时调整。鉴于接连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集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629页。

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① 第一次清楚地把“先城后乡”谋略提了出来。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当日清晨开始强渡长江天险，23日首先解放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接着又攻取了杭州、南昌、上海等大城市，然后占领广大乡村，迅速解放了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事求是地指导作战，灵活而适时地运用“先乡后城”、“城乡并重”和“先城后乡”等谋略，不仅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唯外不唯书只唯实的谋略思维品质，也体现了高人一筹的战争指导艺术。

六、两面包围，三面包围，四面包围，因情而施

四面包围，不使漏网；三面包围，两面包围，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常用的谋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6、1317页。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战争内容作了经典性说明，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写道：“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① 这里所说的“集中全力打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就是两面或三面包围。

两面包围、三面包围的思想，早在红军刚刚建立时就初步形成了。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及农民武装包围了宁冈县城新城。袁文才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进攻开始后，毛泽东令南门、北门部队加强佯攻火力，惊吓敌人，并突击攻打东门。袁文才眼见东门就要攻破，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冲锋，不使敌人逃跑。毛泽东笑着说，开门捉贼易，关门捉贼难，东门、南门、北门三座门都可以冲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工农红军从东、南、北三个门破城而入。城里的敌人发现西门枪声稀少，便一窝蜂地从西门冲了出去。敌人跑到西门外，才发现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了埋伏，刚要调转屁股往城里逃时，工农红军与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到城外，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形成了瓮中捉鳖的局面，不费多大力气就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

"四面包围"是毛泽东在孙子"围师必阙"谋略（三面包围、两面包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又一重要谋略。"围师必阙"是孙子创立的著名谋略，已被古今军事家所认可，成为不易之论，它反映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围"与"阙"的对立的统一。孙子看到有"围"一定要有"阙"，既对立，又统一；如果"围师不阙"，置敌于死地，敌人困兽犹斗，拼死抵抗，会给自己军队造成重大伤亡，甚至造成自己失败。如果"围师有阙"，敌人会失去斗志，争相从阙口逃生，自己不仅可以击溃敌人一部，而且可以歼灭敌一部，自己也可以减少伤亡。随着社会发展和战争发展，"围师必阙"的谋略被"围师不阙"（四面包围）谋略所代替。清朝后期，清将曾国藩率领湘军（清军）在安庆战役、天京战役中，主要运用的谋略就是"围师不阙"（四面包围），杀死全部俘虏，不留活口。这种"围师不阙"（四面包围）的谋略，十足地反映了形而上学思想。曾国藩运用这一谋略取得了胜利，但有明显的缺点：一是给湘军造成重大伤亡；二是旷日持久，如安庆之战长达一年以上；三是俘获较少，不利于用以补充自己。

毛泽东的"四面包围"谋略，表面上看与曾国藩的"四面包围"谋略同属于形而上学，但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毛泽东的"四面包围"谋略，既主张四面包围，又主张优待俘虏，只要敌人起义、反正、投降，就一个也不杀，处处给敌人开着生路——实际上是四面包围又四面开阙，是更高级的"围师必阙"。我们可以进行比较：

孙子的"围师必阙"的谋略，一可以速决；二可以歼灭敌一部，击溃敌另一部，但难以全歼；三可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四可以通过俘获的人或物少量地补充和壮大自己。

曾国藩的"围师不阙"（四面包围）的谋略，一是不能速决；二是可以全歼；三是自己伤亡惨重；四是难以通过俘获的人或物补充和壮大自己。

毛泽东的"四面包围"（四面开阙）谋略：一是可以速决；二可以全歼；三可以减少自己伤亡；四可以通过俘获的人或物大量地补充或壮大自己。

尽管曾国藩与孙子、毛泽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谋略上都不可以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类进攻战谋略的发展轨迹。

孙子——曾国藩——毛泽东

朴素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辩证法

围师必阙——围师不阙（四面包围）——四面包围（四面开阙）

肯定——否定——再肯定（否定之否定）这个谋略发展轨迹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暗合的。

毛泽东抛弃了孙子和曾国藩谋略的缺点，吸取了他们的优点，创立了自己崭新的谋略，既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谋略武库增添了新的武器，也为人类军事谋略武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七、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时分时合，视情而定

毛泽东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①并指出，灵活使用兵力有三个方法：集中、分散和变换。

"化零为整"是集中兵力的谋略。"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②其好处是，集中兵力，以多打少，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在我则士气高涨；速决，则使人民军队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此其一。其二，用力省而成功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82页。

每战必胜，较有把握。其三，能取给于敌，以敌人的大量武器装备和人员补充自己。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诸葛亮的用兵之误："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①他很欣赏李世民的用兵才能，认为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上，"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②

关于集中兵力的规模，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火力和机动等情况而定，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敌人要求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敌人战斗力较强，"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③；抗日战争时期，一般要两倍、三倍或者四倍于敌。粟裕说："现在我们要消灭敌人一个中队，需用一个团的兵力。"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更加强调集中兵力的倍数。1945年10月，刘少奇同志在一份电报里指示全党全军遵守毛泽东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提出必须以超过国民党军五六倍的兵力与之作战。1946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集中兵力的倍数："将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第106页。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第65～66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1页。

斗。”在东北作战时，林彪要求“一个师应找一个营左右的兵力打，一个纵队应找一个团的兵力打，应两三个纵队对付敌一个师”。东北野战军一下江南，打其塔木1个营，竟用了4个师。为此，林彪总结：“运动战中我与敌是四比一，攻坚战中整个来说是五比一，或六比一。”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很大，集中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难以奏效，毛泽东提出“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零敲牛皮糖”。

“化整为零”就是分散使用兵力的谋略。“化整为零”有两种情况，在平时，“化整为零”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在战时，大体上是依下述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① 他同时还强调，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要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同时要给各分散的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间、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82页。

等。

“变换”就是时分时合，转移兵力。为避开敌人的进攻，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就要把部队开到他处；或者为了进攻他处的敌人，也要把部队开到他处，这都要运用“变换”之法。转移兵力的原则是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毛泽东的这一谋略是非常高明的。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毛泽东采取这一谋略指导山西的敌后抗战。到了这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交战1600多次，共歼敌5.4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弱小的人民军队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的力量已经发展到150万之众。弱小的我军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越打越强，越打越壮大。

八、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城阻援，相机而行

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城阻援，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用的谋略。

围城（点）打援，是以次要兵力包围敌人必然增援的城市或要点，诱敌来援，集中兵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围城打援的目的不在围城而在打援，所以用次要兵力围城，围城是假，却假戏真唱。把敌人打急

暴风骤雨制作 柴宇球《毛泽东军事谋略》 www.zhimou.net

了，敌人自然要呼救援军，我再集中优势兵力，选择优良阵地于敌人援军必经之路侧，乘敌运动到我阵地时，突然将其包围全歼。

围城（点）打援的主要目的不是夺取敌人的城市或地方，而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经过多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之后，敌人的城市和地方就易夺取了。

在我军弱小、敌军强大时期，围城（点）打援是一种较好的进攻谋略。1948 年 2 月 24 日，西北野战军包围了宜川城，至 27 日已突破敌外围防御，将敌压迫于城内。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后，一面令宜川守军坚守待援外，一面急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于 2 月 26 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于 29 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料定敌人的企图后，西北野战军除以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的兵力继续攻打宜川、诱使援敌就范外，还集中主力 9 个旅在瓦子街以东设伏待敌，其他各纵队也隐蔽向敌接近。29 日黄昏，我军在瓦子街完成了对驰援之敌的拦截和包围。3 月 1 日上午，“打援”战正式开始，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二纵队由南向北，第六纵队（欠新编第四旅第十六团和教导旅第一团）由东南向西北，第三纵队之独立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第四纵队（欠骑兵第六师）由北向南，四面围攻敌人。在西北野战军猛烈攻击下，

至 16 时，敌公路两侧阵地均已失守，敌全部被压缩于沟内，乱作一团，各自逃生。至 17 时，援敌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打援”任务胜利结束，后在我军持续打击下，宜川守敌全部被歼。

攻城打援，是以一部攻取敌人的城市和据点，以另一部歼灭援敌之全部或一部的谋略；打援攻城则是以一部首先包围敌人的城市和据点，吸敌来援，以另一部消灭援敌，然后再攻取敌人的城市或据点。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济南战役是运用“攻城打援”谋略的范例。

1948 年 9 月，国民党军被迫采取重点防御后，以第二绥靖区部队 11 万人守备战略要地济南，并准备以徐州地区主力 17 万人随时北援。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代理政治委员粟裕，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攻城打援”谋略发起济南战役。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 6 个半纵队和地方武装共 14 万人为攻城兵团，担负攻城；由野战军指挥 8 个半纵队（内中原野战军 1 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 18 万人，部署在滕县（今滕州）、邹县（今邹城）、金乡、巨野地区，担负阻援。9 月 16 日，攻城兵团分别由东西两面对济南发起攻击，至 18 日攻克外围要点多处，并以炮火封锁了飞机场，19 日晚，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

欢迎访问:中华谋略网 网址：www.zhimou.net 欢迎加入中华谋略 QQ 群：31301069 & 14247021 振兴民族谋略，弘扬人间正气。

取下，率2万余人起义，攻城兵团乘胜攻击，突破内外两道城垣攻入内城，激战至24日，全歼守军，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在华东野战军阻援兵团严密监视下，未敢北援。

“攻城阻援”，则是指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敌人的城市或据点，而以次要兵力阻击敌之援军，以保障我攻击城市或据点获胜的谋略。目的不在打援，而在攻克城市或据点。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就是“阻援”的范例。1948年10月9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向辽宁锦州发起攻击后，国民党军急调华北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1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会同锦西、葫芦岛第五十四军和暂编第六十二师向锦州驰援。10日，开始向东北野战军塔山（今属葫芦岛）一线阻援阵地猛攻。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左凭渤海、右依虹螺岘高地，顽强阻击，经连续6昼夜奋战，打退了国民党援军3到5个师每日3次以上的轮番攻击，共歼敌7700余人，阻援部队虽付出了较大伤亡，但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保障了主力兵团攻城任务的完成。

围城打援、攻城打援和攻城阻援，相辅相成，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四者巧妙地配合运用，使敌防不胜防，吃了不少苦头。

九、战略持久，战役速决，内线防御，外线进攻

在战争的谋划指导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战略、战役各个层次上对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等都有独到的谋略建树。

比如，中外历代兵家都主张“兵贵胜，不贵久”，主张“速战速决”，而毛泽东则反行其道，提出了“持久战”理论；他虽以“持久战”而著称，但又主张战役战术的速决，提出“战略的持久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持久战的例子不须多说，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战役速决战就有很多，平津战役的前期部署就是一例。

平津战役前，蒋介石要傅作义军队撤往江南，傅作义则认为，如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撤往江南，迟早必被蒋介石所吞并，因而十分迟疑。傅作义还认为，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不可能立即入关，起码需要休整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才能入关作战，他想利用这个时间，借美国提供的武器，扩充50万兵力，以加强平津防务。他自信是能够守住平津的，或退一步说，即使到无法坚守平津时，再撤往绥远“老家”也为时不迟。但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视了对手是毛泽东。

平津战役能否得手，关键在于能否稳住和网住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稳住它的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网住它的关键在于行动的神速。为达到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不使逃窜的目的，毛泽东代表中央军

委于11月18日电告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① 针对林彪拖延入关时间，毛泽东批评说，你们是早点入关，抓住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平津地区呢，还是等平津的敌人跑了，你们再去追击，追到很远的地方去歼灭他呢？他要求东北、华北两个野战军必须迅速地完成对平、津、塘、张之敌的分割包围，使敌人既不能西窜，也不能南逃。为完成好这一任务，他又电告东北野战军："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② 同时，要求部队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后，再行休整。东北野战军主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早入关，完全打破了傅作义坚守平津、扩充兵力、加强防务的如意算盘，蒋、傅两系军队完全处于被分割包围的局面，成了一条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39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54页。

弹不得的死蛇，平津战局骤然间落入毛泽东的指掌之中。

在内线与外线的攻防问题上，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谋略思考，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主张避敌锋芒，诱敌深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瞅准时机，跳出包围，迂回敌后，灵活出击，力求使战场态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广泛实施"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有效地改变了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敌人的"扫荡"，我敌后军团采取"翻边战术"，在敌人的"扫荡"一开始，我军即进行反"扫荡"，除留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在内线坚持斗争外，领导机关率主力部队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我之外线去，袭击敌人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向敌占区回援。当敌人回援时，再抓住敌人薄弱的一路，内外线协同配合，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给敌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敌人想打又打不着，躲还躲不掉，这样就迫使敌人回撤部分兵力或收缩战线，较好地策应了我军内线作战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十、避实击虚，避虚击实，先弱后强，先强后弱

"虚实"是古代军事术语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指弱小与强大，被动与主动，无备与有备，怯懦与勇敢，饥饿与饱逸，惰归与锐气等。一言以蔽之，不利

的方面是"虚"，有利的方面是"实"。

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选择何种手段打击敌人？孙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避实击虚"谋略。我军在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进攻前期，基本上也是运用"避实击虚"谋略，例如"拣弱的打"、"避敌主力，攻其虚弱"、"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等等，都体现了"避实击虚"的特点。长征期间，红军刚到扎西地区，蒋介石就调集人马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决定避其锋芒，寻敌弱点，甩开敌人，寻机破敌。2月11日开始，红军挥戈东进，把进攻矛头指向敌人营垒中的薄弱处黔军王家烈部。18天中，红军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以3万余人之众，摧枯拉朽，一路横扫1100余里，不仅使我军摆脱了险境，而且取得了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巧妙运用孙子的避实击虚的谋略，还在于他创立了"避虚击实"谋略。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已成绝对优势，敌人已成绝对劣势。为了迅速歼灭敌人的主力，迅速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果断废止了"避实击虚"而采用"避虚击实"的谋略，指挥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瞬目的速度，避开敌人的零星部队，首先包围敌人的主力部队而消灭之，然后再消灭敌人的零星部队；首先攻取大城市，然后再攻取中等城市、小城市和乡村，使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大陆。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也是毛泽东在我军处于不利态势下采取的重要谋略。193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4月1日，敌人20多万兵力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万多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少数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部队3万余人秘密退至龙冈、上固、东固地区集结。根据敌情报告，西边富田之敌第5路王金钰部所属各师刚从北方调来，地理不熟，水土不服，战斗力较弱，毛泽东决定先打该敌。5月16、17日，红军待敌进至中洞、九寸岭地区时一举将敌第二十八师全歼，并将敌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大部歼灭，接着向东横扫。5月19日，在白沙又歼灭了企图北逃的敌第四十三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5月22日，在中村歼灭了前来西援的第二十七师近一个旅。敌人第六路军各师见势不妙，纷纷逃窜，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攻克广昌，打死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敌第五十六师仓皇逃回建宁。这一仗，毛泽东运用"先弱后强"的谋略，达

到了“乘瑕则神”① 的效果。

避实击虚、先弱后强一般是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采用的；避虚击实、先强后弱一般是在力量占优的情况下采用的。“先弱后强”与“先强后弱”指明了打击的顺序，“避实击虚”、“避虚击实”指明了打击的重点，四者构成了在不同情况下克敌制胜之策的完整体系。

十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长击短，趋利避害

毛泽东用兵打仗的突出特点，是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有利则战，不利则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际上讲的是主动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有趣地发现：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呢，他常常按自己的节奏跳舞。即使在跳舞时，毛泽东也是讲主动权的。当毛泽东的舞步转移到战场上时，敌人也总是跟着他的舞步旋转。

① 《管子·制分》曰：“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意思是先啃硬骨头，则本来好打之敌也会变成难打之敌；先拣弱的打，则本来难打之敌也会变成好打之敌。

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奥妙，就是两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就扑空；我打你，是歼灭战。“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不打，老是跑，是机会主义；打不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1930年，红一方面军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幅对联，既清楚明了地概括了红军作战原则，也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思想。

保持主动地位就要善于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无论战略指导还是战役战术指导，毛泽东都要周密地分析敌人之长处和短处、强点和弱点，我方的优势和敌方的优势等诸因素，务必找出克敌制胜的战法来。他认为：“‘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①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上，他充分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等长处，分析其侵略战争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本质，以及军力、经济力都经不起长期消耗等弱点；认识到我们缺少组织，武器装备短缺等弱点，但实行的反侵略战争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并有广大国土可以周旋等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58页。

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使我方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敌方弱点得以充分暴露。

在战役战术指挥中，毛泽东同样注重扬长避短，以长击短。坚持你打你的阵地战，我打我的运动战；你打你的正规战，我打我的游击战；你打你的步步为营，我打我的诱敌深入；你打你的分进合击，我打我的各个击破；你打你的扫荡战、围剿战，我打我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始终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同时，通过各种方法，扬己之长，补己之短，力求获利最大，受害最小。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毛泽东坚持避免不利决战，为达到既定的作战目的，不惜“先退一步”，待实力强大后再转入进攻，这样既可以大量歼敌，又可收复失地。始终做到打主动仗、主动地打仗，趋利必得，避害必安，用长打必胜，击短攻必克。

十二、诱敌深入，各个歼敌，歼敌为上，守土为下

面临强大敌人的进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实力，待机破敌。这就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躲开敌人的致命打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在四川叫“收紧阵地”，在江西叫“诱敌深入”。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者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打烂了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然而事实证明，我军主力如不退

让一步而被敌围歼，一切都无从谈起。外国某军事家曾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之有利的情况始求作战。”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诱敌深入首先要做好反“围剿”的准备。退却、征集新兵、筹划财粮、处理政治异己分子等都需要时间。其次是造势。退却的目的除了保存军力之外，就是要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以便我举行反攻。“诱敌深入”之后，就要“聚而歼之”。先退一步，目的在于“后发制人”。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我军执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方针，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待敌成为分散、孤立、弱小之敌后，一举将其全歼，连敌军师长张辉瓒也被活捉。余敌畏打，纷纷逃窜，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据说张辉瓒被俘后，希望能够与毛泽东拉拉老乡关系免于一死，见到毛泽东后，连忙鞠躬敬礼。毛泽东未等他说完，打断了他的话：“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说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张辉瓒吓得面如土色，连说有罪有罪，后来被公审处死。

诱敌是为了歼敌，歼敌必须集中兵力。毛泽东认为：战略上要以弱胜强，战术上要以多胜少；战略上要以一当十，战术上要以十当一。他反对军事平均主义——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全线出

击，四面出击。主张一个拳头打人，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在一个时期内，主要作战方向应有一个，而不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集中兵力也不是绝对的集中，作战方向也不是绝对只有一个，在兵力十分优势的条件下，也可以同时歼灭多个敌人。

在歼敌与守土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歼敌为上，守土为下。但对这个问题，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好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难做。毛泽东就打比方说，“一个人背着满包裹的金银财宝，遇到了要抢他财宝的强盗，这个人该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扔下包裹，他的手脚就不灵便，跟强盗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了，金银财宝也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裹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与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保住了金银财宝。”[1] 这就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

存人失地，并不是主张轻易地放弃地方的逃跑主义，而是以坛坛罐罐来换取时间，以时间来改变力量对比和攻守态势。通过主动地后退一步，诱敌分开五指，孤军深入，待敌弱点充分暴露后，果断发动进攻，歼灭突出冒进、孤立分散之敌，不断改变战场态势，不断灵活转运兵力，不断寻找新的战机。毛泽东

① 《警卫毛泽东纪事》第31页，阎长林。

始终能科学地处理歼敌与守土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城市和土地为主要目标，既要大量地歼灭敌人，又要有效地保存自己，主要通过大量地消灭敌人，更好地保存和壮大自己，更好地保护和扩大土地。

第七章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现实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战争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着新情况、新形势，有人产生了疑惑，认为在信息化条件下，毛泽东军事谋略已经过时了，在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面前，毛泽东那一套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谋略思想和战略战术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显然，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军事谋略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军事谋略，其中所闪烁的真理光辉、所蕴含的大智谋大智慧，永远是谋划现实军事斗争准备、指导信息化战争的强大武器。

一、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是我军“以劣胜优”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高超智慧的结晶，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符合我国我军的客观实际。坚持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是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以劣胜优的必然要求。

（一）主客符合的智慧结晶

同过去相比，当今我国的国情和军情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表现为，第一，我国已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已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物力支持，使我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军队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与敌打堂堂之阵的物质基础有了质的飞跃。第二，我军的任务已由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些情况与过去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仍然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仍然要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仍将主要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进行作战，仍将面对强大的敌人。因此，毛泽东以弱胜强的谋略指导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加之我们始终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即使将来军队强大了，我们也不可能去侵略别的国家，不会去搞霸权主义。因此，毛泽东谋划指导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多次防卫作战的奇谋妙计，以人民战争为核心的诸多战略战术原理和战法，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今天，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扑面而来，我军为适应这一形势需要，正在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

事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创立的军事谋略思想的彻底抛弃，不是对过去所有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对这些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将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善于吸收毛泽东军事谋略中的思想营养，不仅不会影响和减缓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相反，只有坚定地、科学地、辩证地汲取其思想精华，才能加速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步伐，才能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更有把握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二）以劣胜优的常胜法宝

过去同敌人交手，我们都处于弱势，常常是以手榴弹对敌人的原子弹、以小米加步枪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以两条泥腿子对敌人的四个车轮子。现在我们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我们加速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强敌也在加大军队的改革。因此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态势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军事谋略，仍将是我军的必然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军过去革命战争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战法今天可能不适用了。就是毛泽东本人也反对套用前一场战争的经验指导下一场战争。但这些谋略和战法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原理、所揭示的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是不会过时的，这

些原理和规律仍将具有跨时空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指导价值。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并善于同强敌交手的雄伟胆略和实战经验，也为我军在信息化条件下勇挫强敌提供了有力的信心勇气和智力支持。

实际上，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或借鉴，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自觉选择。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指出，毛泽东一系列军事谋略思想“对于我们党领导这场抗战（抗法战争）有着重大贡献。自1950年以来，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我国军民更有条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我国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去。”时至今日，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等许多国家，他们对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军事谋略思想仍然非常崇拜。在这些国家，人们曾经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英国迈克尔·麦略特·巴特曼指出：“在印度支那，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使越南找到了另外的对策，代替了他们所没有的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①

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戴维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

①《东方的失败》，［英］迈克尔·麦略特·巴特曼著。

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够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之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① 作为老一辈革命先驱的接班人，我们更有理由去继承他们留下的优秀思想财富，更好地将其发扬光大。

（三）勇挫强敌的坚强保障

当前，之所以有些人对毛泽东军事谋略特别是对人民战争思想（"用众"谋略）心存疑惑，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和道理的。这是因为，信息化战争的作战目的、规模和区域有限，速战速决成为实施攻击一方的重要目标，快速动员各种作战力量，形成和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十分困难；信息化条件下战场空间空前扩大，交战已扩展到海洋、空中、太空等领域，传统的人民战争只是利用陆地来进行，在广阔的交战空间里，人民群众插不上手、使不上力；信息化战争主要表现为精兵利器的对抗，人民群众对信息化战争的了解很少，难以直接支援战争，等等。可见，毛泽东军事谋略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确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

① 《外国军事学术》，1983 年第 22 期增刊。

新问题、新挑战，如果简单地套用毛泽东军事谋略中的只言片语就想打赢一场战争，是不现实的，毕竟毛泽东军事谋略不是可资套用的现成答案，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灵药"。但只要稍作分析就不难看出，人民战争不仅现在没有过时，就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然不会过时。

首先，在信息化条件下坚持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具有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上看，敌强我弱的态势不是现代的信息化战争才出现的，过去革命战争的环境和态势比现在更困难、更恶劣。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对当时的困难局面有过描述："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二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我军依靠人民，最终渡过了困难。目前，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与强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总的说来，敌人有的，我们也基本都有了，而且在高技术领域还占有一席之地，加上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有能力同敌人打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其次，在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比

过去更加强大。过去的年代里，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只能靠人力、粮食等等，支援能力十分有限。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不仅可以提供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还可以提供财力、科技力、精神力等在内的强大支援，足以使我军更有理由进行人民战争。

第三，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支持战争的态度比过去更加明确。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总体上是积极支援战争的，但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反动宣传，使有些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还不是十分了解，有些群众对革命战争抱着观望甚至悲观的态度。当前，我军所进行的维护祖国统一、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一直都为人民群众所坚决支持和拥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战争的群众基础一定会更加厚实。

第四，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手段比过去更加多样。信息化条件下，人民群众支援战争不仅可以通过提供人才、物力、财力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援的方式。特别是在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人民群众还可以在网络这一无形空间上为战争提供强大支援。据悉，到2005年10月，中国网民已经突破1亿，专业技术人员已突破100万人，这个数字正在进一步扩大。面对强敌的侵略或干涉，人民群众不仅可以在有形的战场上直接提供支援，还可以在无形空间里广泛开展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计算机病毒战、网络战，为有形战场提供了强大支援。

关于人民战争问题，徐向前元帅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夕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将逐步放弃传统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战争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战争形式。过去我们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坚持打人民战争。现在我们有了飞机、坦克、导弹和核武器，同样还要打人民战争。我们应看到，尽管未来战争与以往战争相比，在武器和规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我们所进行的战争的反侵略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并得到世界人民支持和同情的人民战争，战争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我们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人民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制服敌人的法宝。"邓小平同志则更掷地有声地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的武器也能打，最后也可以打胜。"①

二、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重在掌握其方法论精髓

①《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32页。

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情况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理论、战争形态、战争手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毛泽东军事谋略所蕴含的谋划战争的方法论原理并没有过时，特别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指导战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胜利、着眼战争的特点规律谋划战争等等方法论原理，依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未来信息化战争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筹划谋略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一直面对强大的敌人，其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都要强于我军，因此，我军谋略筹划和运用的立足点始终是以劣胜优。而实现以劣胜优的关键，就是要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和指导战争。教条主义者指导战争，照搬照套外国的战争指导经验，搞城市武装起义，搞总决战，搞阵地战，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主观主义者指导战争，则不考虑自己部队的情况，不考虑敌人的情况，单凭主观愿望和一时冲动，也对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害。毛泽东认识到在敌我双方施计用谋的对抗中，只有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先谋自保，确保生存，才能谈得上主动和胜利，因而其谋略运筹始终都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现实和未来军事斗争准备中，如果我

们不注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注重研究对手和研究自己，那么我们对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导，就不可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指导，就可能招致未来战争中的重大失败。

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就要熟知敌我情况。就是要在熟练掌握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下筹划谋略。战争所要面对的情况，不是战争某一方的，而是战争双方的；不是战争某一方面的情况，而是战争双方各个方面的情况。不同级别的指挥员掌握情况的范围不同，但都要将自己所应掌握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敌情要做到成竹在胸，这样运用谋略才能得心应手。否则就会像刘帅所说：五行（敌情、我情、天候、地形、任务）不定，赢得干干净净。目前，一些外军研究机构已经将敌对方指挥员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指挥员的任职经历和性格特点输入到数据库中，供己方指挥员临时查阅，以利于其指挥员在需要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可见，提高指挥员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必须从平时的点滴积累做起，从熟悉对手开始。只有提前准备，未雨绸缪，方能在未来战场上从容应对，百战不殆。

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就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指出，“做一个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所能办得到的，必须在战争的实践

中才能做到。”① 在相对和平年代，就要善于从以往的大量的战例中，从当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中，从新兴的战争理论中，从计算机模拟系统提供的虚拟现实环境中学习战争、研究谋略，在学习、研究、推演、实践中不断提高用谋水平。对于现代指挥员，设计好知识结构尤其重要。信息时代的指挥员与其他时代指挥员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要求更高。因此有人认为，现代军事指挥员要建立“干”字型知识结构。“干”的第一道“一”是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基础知识等；第二道“一”是辅助知识，主要包括战争史、军事思想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地形学、军事气象学、军事仿生学、军兵种知识、心理学、系统论等；“干”的“丨”是专业知识，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军事谋略学、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领导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国防经济学、军事心理学、军事决策学等。也有人认为，谋略活动主体应具备“T”型知识结构。在纵向知识积累上，应精通本专业、本领域的知识，精通历史，具有内行的管理和决断能力。在横向知识积累上，应了解邻近区域的发展动态，努力丰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社会学、人文学、心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学、政策学、传播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认为，现代指挥员应该具备“米”字型或“井”字型的知识结构，这两种知识结构都是开放型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以谋略学、战略学、军事思想等为核心，对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基础知识兼容并蓄，并广泛吸收军事历史学、军事地形学、军事气象学、军事仿生学、军兵种知识、心理学、系统论、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技术学、指挥学、运筹学等知识而形成的科学完整的体系结构。对于未来指挥员，在开放型知识体系中，军事谋略、信息化战争理论、信息作战技术、军事地理、军事气象、社会学、国际法等显得十分重要，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必须牢牢掌握。

一切从实际出发，目的在于使主观指导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了解了对手、丰富了知识还不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十分重要。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法就是辩证思维。利与害、进与退、主与客、强与弱、速与久、刚与柔等等看似单一的或者只为一方所有的事物，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中性的、敌我双方共有的，因而可以不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总能使自己的主观指导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在信息化条件下，由于战场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因此思维方法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除了辩证思维方法外，传统的思维方法如经验思

维、逻辑思维、直觉思维，现代的发散思维、求异思维、系统思维、超逻辑思维等等思维方法，对于现代指挥员都是十分重要的，应当认真学习把握。

（二）着眼战争特点和规律筹划谋略

着眼战争自身的特点规律研究指导战争，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高技术战争作为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必须把握其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和指导战争。一要因“时”筹谋。就是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灵活地筹划谋略。“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个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1]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我军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后期主要采取正规战，抗日战争时期转变为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变成正规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又变成大兵团正规战。当前，信息化战争已登上战争舞台，着眼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批判吸收传统谋略的合理因素，借鉴其方法论精髓，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生成实效管用的谋略，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必然要求。二要因“地”筹谋。革命战争时代，作战的空间有限。毛泽东根据不同地形条件，谋划不同的战争指导方法，如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地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战、地雷战、麻雀战、蘑菇战等等。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空间拓展到了陆、海、空、天、电甚至网络、认知空间，要求谋略的运用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必须着眼海上、空中、外层空间、电磁空间乃至网络空间作战的不同特点，灵活地运用谋略。因为这些空间之间的联系正越来越紧密，一个空间的作战失利直接关系到另一空间的安危，而且相对于强敌来说，我们在这些空间上总体上还处于劣势，必须针对这些空间的作战特点，巧妙地运用谋略，才能抢占上风，赢得先机。三要因“敌”筹谋。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筹划不同的对策，是毛泽东谋划和指导战争的一贯做法，也是历史上一切杰出谋略家的基本经验。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情况千变万变，但着眼敌人的特点用谋施计的基本制胜原理不会变。要加强可能作战对手民族特点、作战理论、武器装备、民族意志乃至可能面对的敌方指挥员的脾性、修养、用兵特点等方面的研究，以便因敌制宜，因敌施法。总之，战争的特点规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战争指导规律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决不能把过去战争中成功的一些具体谋略应用“移植”到高技术战争，更不能期望用千篇一律的模式来指导未来战争。那种不顾每一次战争的具体特点，不考虑不同的时间、空间、敌情乃至我情的差异，僵化教条地照搬照套过去的做法，必然要招致失败。

（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筹划谋略

毛泽东指出，战争中的各种条件，还只是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可能性，要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争的胜利，就是以智驱力，用智慧把各种条件结合起来，能动地争取胜利的过程。我们的国情、军情和整个世界的发展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军事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军事斗争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自发完成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我们才能实现既定目标；主观能动性发挥得不好，我们就可能丧失自己的优势。

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第一，要利用当前的和平时期（或者叫战争准备时期）来大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提高施谋用计的物质基础。第二，要加强信息化条件下谋略运用研究，切实结合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技术发展的现状，认真设计运筹符合信息化战争特点的奇谋良策。

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谋略万能倾向，认为只要有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指导，就必然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谋略的作用简单化、扩大化；另一种是技术万能倾向，似乎技术优越的一方必然就能够战胜技术较低的一方，“技不如人”的一方不可能战胜技术上占优势的一方。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中国是“谋略之乡”，具有能谋善略的优良传统。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凭借出神入化的谋略指导，以小米加步枪一次次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仍然要发挥谋略优势来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不足。但是应当看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传统谋略的冲击和影响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纵观近几场高技术战争，获胜者都是装备优良的一方，其中固然有国家综合实力的因素，但是应当看到：技术装备优于人，战场主动权就多于人；技术装备不如人，谋略运用的条件就少于人。在技谋合一的今天，谁占有技术和装备的优势，谁将同时占有谋略运用的优势。因为技术的优势已经使谋略运用的手段更多样、方法更灵活、效果更显著。一味地局囿于传统经验，满足于以巧制敌，虽可取得一定效果，但在面对“非接触”、高精度打击之敌时，就可能出现“看不见”、“够不着”、“打不准”、“吃不掉”等问题。况且，我军已经许多年没有经受战争的磨练，各级指挥员的谋略水平是不是一定比对手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客观审视的。

我们常以“谋略型”、“力量型”和“技术型”军队来形容中西方军队的差别，这容易给人以西方军

队不重视谋略的误导。实际上，西方军队从来都是重视谋略的。菲力普、亚历山大、汉尼拔、拿破仑、麦克阿瑟等等西方名将，无一不是谋略运用的大师；2000年前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在他的《谋略》巨著中就记载了580多个以谋胜敌的生动战例；西方许多彪炳史册的战例，也几乎都是谋略胜敌的典范；甚至《旧约全书》中都有"你应该运用诡计进行战争"的告诫。可见，重视谋略、运用谋略在西方并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军队对军事谋略越来越重视，甚至把《孙子兵法》等东方谋略经典列为官兵的必读教材。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借鉴东方的谋略精华，来实现东方谋略与西方高技术的"优势互补"，从而在"技"与"谋"上实现"双赢"。美军在近几场战争中，正是把高技术与谋略有机结合，从而以较小的代价、较短的时间取得了巨大的作战效益，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认真学习的。

当前，我军面临的战略形势十分严峻，对手十分强大，要求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加紧推进现实军事斗争准备。一方面，我们要以信息化战争的需求为牵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武器装备，努力缩小与强敌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与规律，结合手中的武器装备，依托首长机关演习、实兵演练和计算机模拟等平台，认真设计磨练实效管用的谋略战法。通过谋略与技术的双向牵引、螺旋上升，实现技术与谋略在信息化战争层面上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使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勇往直前，无往不胜。

（四）创造性地运用传统谋略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维的优秀品质，是活学活用，不断创新。他的谋略运筹始终做到根据不同的战争形势，确定不同的战略方针；按照不同的战场态势，选择不同的作战方式；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战役战术手段，因敌制变，因地制变，因时制变，因情制变，真正做到把古人的战争理论用活，把外军的战争经验用活，把握常规，不循常法，临机处置，活用原则。这种灵活机动的谋略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战胜强敌、永立不败之地，都是每用必验的法宝。

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研究运用谋略，就必须紧密结合信息化战争的特点，着眼战争正在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这一现实，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不断提高谋略运用的实际效果。

一要敢于超越，赋"旧"以"新"。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谋略思考始终做到自主、自立、自创、自用，借鉴古人又不拘泥于古人，研究外军又不套用外军；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无照搬照

抄的痕迹；熟练运用了大量古人的战争经验，但通篇都是全新的战略战术。他一切按新的战争情况进行新的思考，研究新的战法，总结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这种科学的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精神，大胆地创新战略战术的勇气，仍将是我们借以研究指导信息化战争的宝贵财富。

二要紧跟时代，以“新”驭“新”。就是要善于运用新的作战思想、新的军事理论来驾驭新兴的军事技术、新式的武器装备、新型的军兵种部队。当前，世界上正在经历一场新军事革命，这是一场以安全态势演变为动因、以高新技术发展为动力、以军事观念转变为牵引、以体制编制调整为中心、以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为核心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军事大改革。现代指挥员要想提高驾驭信息化战争的本领，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紧跟技术发展的前沿，紧贴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找准技术与谋略结合的切入点，认真地设计筹划信息化战争谋略。

近年来，许多专家呼吁“让技术插上谋略的翅膀”，“让谋略融入高科技的基因”，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和要求。在以“新”驭“新”的具体方法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绝技制敌”、“虚拟掩真”、“屏幕示形”等措施，提出了“全维欺敌”、“综合制敌”、“全民扰敌”等手段，提出了“顺流推舟”、“施毒浊流”、“控时成事”等办法，提出了“思维导向”、

“谋势慑心”、“信息显能”等举措。有的则提出要“善于利用新型探测与制导技术筹划‘体系瘫痪’谋略”，“充分借助新型伪装与隐身技术筹划‘示形欺敌’谋略”，“充分利用电子和网络攻防技术筹划‘批亢捣虚’谋略”，“充分借助智能决策技术和网络系统精确快速筹划谋略”等等。这些思想都是着眼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运用传统谋略的结果，是对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创造性运用，很有启发意义，值得加以深入地研究。

三、以毛泽东军事谋略为指导，必须注重谋略与技术的有机统一

高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确给毛泽东军事谋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乃至每一项技术的背后，又都能找到谋略的影子。谋略是技术的“触发器”，决定着技术开发的方向；谋略是技术的“指挥仪”，决定着技术作用的方向和方式；谋略是技术显能的“催化剂”，决定技术威力的发挥程度。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谋略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在信息化条件下，要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方面，要清楚地看到谋略对技术的导向和决定作用。过去，诸如“声东击西”之类的谋略，主要

是通过“人脑”的智谋较量或巧妙地调动兵力形成“战场迷雾”来达成，在信息化条件下，虽然传统手段难以达成预期效果，但人们把谋略思想“物化”成相关的技术手段，往往也可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达成更好的效果。海湾战争中，美军用电子战技术在伊军指挥系统的电子屏幕上造出了从科威特南部海岸登陆之“势”，迫使伊军将重兵集团调到科威特，而美军主力则绕道伊沙边境从伊拉克中部切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伊军后方，成功地达成了“声东击西”。在这里，展示给人们的是技术的威力，而实际上，产生这种技术的根本因素还是人的谋略。没有高超的谋略思想作指导，人们就不会自觉地去发明或正确使用这种技术。高技术及其武器装备不过是人的谋略思想的物质产物和外在体现。在今天的信息化条件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美军，反而更加重视丘牛大车时代产生的《孙子兵法》，并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作为官兵必读的书目就足以说明，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其方法论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失色，其中蕴含的制胜机理仍然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只要善于根据现时现地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地辩证地运用，就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谋略的运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谋略与技术是战争制胜要素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特

别是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一些难以想象的谋略都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其效果十分显著。比如，巡航导航、精确制导炸弹的出现，可在千里之外、九天之上“直取上将首级”，轻而易举地达成“擒贼擒王”；侦察卫星、侦察飞机的升空，可在广袤的空间将战场情形尽收眼底，有效地实现“知己知彼”；电子、网络侦察等技术可在无形的空间里将对方的绝密资料尽收囊中，巧妙达成“明察秋毫”；智能武器可对敌方重型装备的薄弱部位实施攻击，自动实现“避实击虚”；新材料技术的出现使示形的手段更加出神入化，更好地实现“瞒天过海”；电子干扰、网络攻击等技术的发展，可使对方指挥系统瞬间变成“聋子”、“瞎子”甚至“呆子”等等这些都说明，技术的发展，使谋略的作用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谋略的制胜价值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同样，谋略对抗的活动，又迫使技术向更新、更高、更深的层次不断发展。有理由相信，有了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指导，技术的效能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将会如虎添翼。

不难看出，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改变谋略的内在属性和制胜价值，改变的只是谋略的作用方式、谋略的作用范围和它的表现形式，其运用的基本原理没有变，运行的基本机制没有变，制胜价值没有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

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毛泽东所说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指挥的正确与错误，主要就是指战争中的军事谋略的作用。科学的、高明的军事谋略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谋略失误则必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就是军事谋略的本质。

战争首先在争谋，打仗首先在打将。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战争，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场“高智谋”的战争。美军虽然在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军依然大量运用了宣传战、心理战、外交战、经济战、情报战；大量运用了避实就虚、隐真示假、利而诱之、亲而离之；大量运用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文化渗透与作战行动相结合、金钱收买与威逼利诱相结合，等等，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大的作战效益。同样，作为劣势的伊拉克方面，由于零星地运用了一些谋略，所以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萨达姆政权长期的专制统治，对外交恶周边邻国，对内失去军心民心，使得一些本该大放异彩的军事谋略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加之这次战争的作战双方在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等方面极其不对称，所以战端未开而伊方败局已定，因此不能仅以战争的结局来评价谋略运用的成败得失，更不能因此得出谋略过时的结论。不过我们透过作战双方谋略运用的一斑却也可以看出，在信息化的今天，无论是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还是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无不高度重视谋略的运用。可以预言，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谋略仍将贯穿战争的始终，仍将发挥着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

总之，信息化战争千变万变，但信息化战争的本质不变，仍然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目的不变，仍然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形式不变，仍然是攻防矛盾运动，仍然是力量的竞赛，仍然是激烈的精神对抗和智力对抗。我军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交手，离不开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指导，离不开人民战争，离不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对于诸如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扬长与补短、趋利与避害、攻城与攻心以及虚与实、奇与正、战与和、走与打乃至建设国防、领导军队、谋划作战等等大量奇妙生动、永远不朽的谋略思考，是我们巩固现代化国防、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4.《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

8.《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

9.《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

10.《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11.《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2.《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13.《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14.《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张万年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15.《军事战略思维》，李际均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16.《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7.《中国古代兵法精萃》，吴如嵩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18.《指挥决策与谋略》，钱汝益著，昆仑出版社，1999

19.《毛泽东武略》，胡哲峰著，人民出版社，2001

20.《毛泽东军事谋略论》，牛力著，解放军出版社，2004

21.《军事谋略学基础》，黄培义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22.《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人民出版社，2001

23.《中国战争通史（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24.《警卫毛泽东》，阎长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25.《毛泽东大智谋》，柴宇球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26.《谋略论》，柴宇球著，蓝天出版社，2003

27.《西洋世界军事史》，［英］J·F·C·富勒著，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8.《战略欺骗》，［美］唐纳德·丹尼尔等主

编，徐晓军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29.《毛泽东》，［英］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红旗出版社，1995

后 记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颗耀眼明珠，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强大敌人进行的长期、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创立的军事谋略，是人类谋略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谋略，能更准确、更深刻地领悟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指挥艺术，提高驾驭信息化战争的能力。为了便于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要义，我们以200万字的《毛泽东大智谋》为基础，经删简整编，形成了这本小册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炳彦、牛力、黄培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吸收了他们的宝贵建议；在编辑校改过程中，吴启诚博士付出了辛苦劳动；付梓出版前，周师华、钱建新、朱华宽、仲健等同志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解放军出版社张俊敏编辑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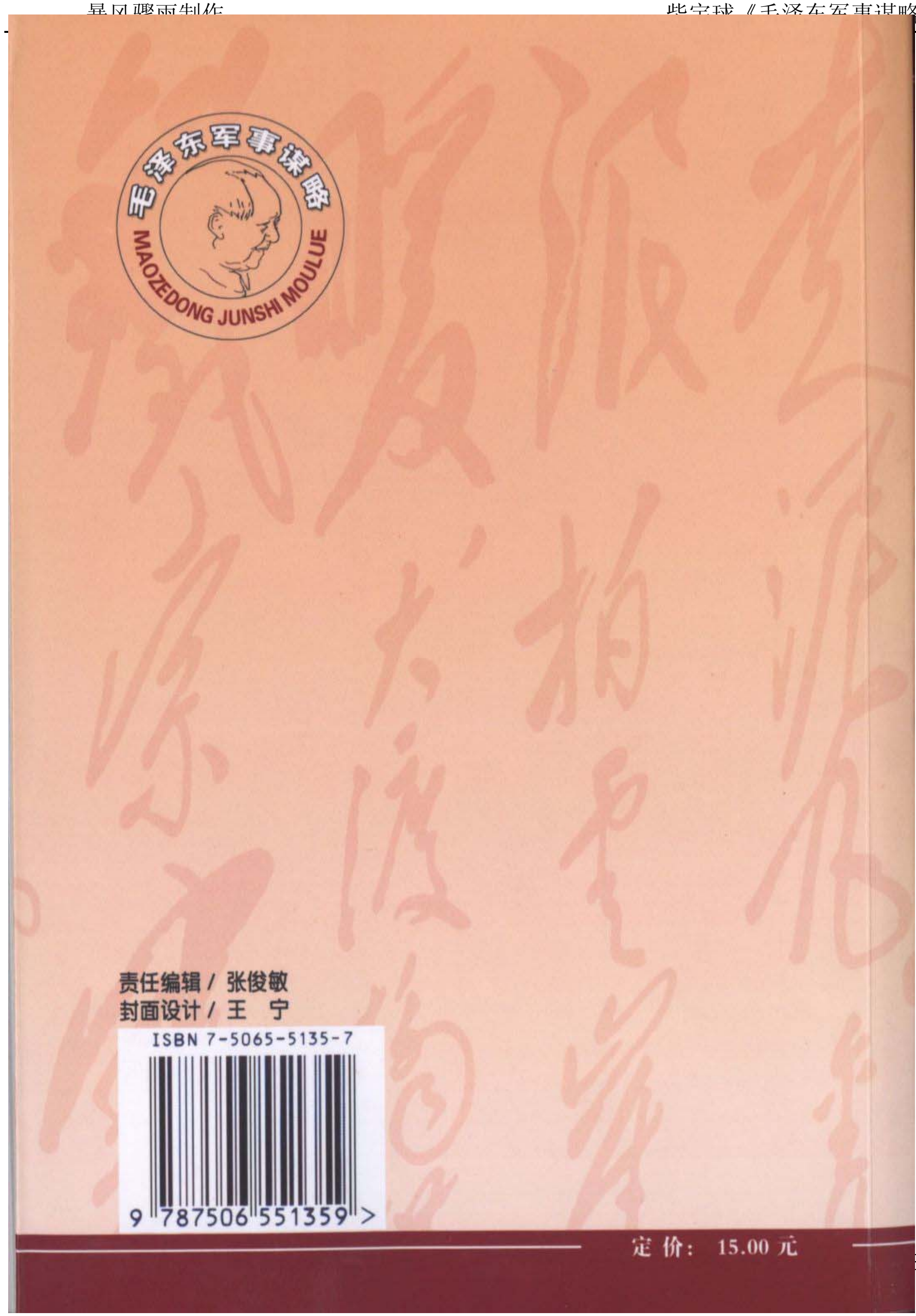
作　者

二〇〇六年四月于南京

更多信息请登陆谋略网：

http://www.zhimou.net

http://www.chaiyuqiu.com


毛泽东军事谋略
MAOZEDONG JUNSHI MOULUE
责任编辑／张俊敏
封面设计／王　宁
ISBN 7-5065-5135-7
9 787506 551359 >
定价：15.00元